

REMEMBRANCE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Aperiodic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记忆》282期

华忆图书专辑（4）

【答客问】

有劳君子遥相问，道是有号又有书

【现代化研究】

楚天江 被西风吹尽——中国现代化进程与未来

本书简介

前言/后记

第一章 文明的冲突——失去皇帝的国家/目录

【历史研究】

周孜仁 云南文革史稿（上卷）

内容简介：第一卷 阎红彦时代/第二卷 军管时代

云南文革史稿小引/启之

导言：历史书记员的心愿/周孜仁

【文艺研究】

启之 中国电影：一个制度与观念的历史（下卷）

——文革电影（1966—1976）

导言/结语：清扫旧影坛，建设新文化

后记：我的“三要三不要”

第十章 文革故事片概说/目录

【散文随笔】

刘家驹 我的军旅见闻

《军旅杂忆》序——心和血的记录/鲍彤

军中董狐笔——怀念刘家驹/高瑜

我的留言（代后记）/刘家驹 绝笔

【编读往来】

赵大为有问，老方有答

【本刊声明】

【答客问】

有劳君子遥相问，道是有号又有书

问：在美国十大华文出版社之中，华忆有什么优胜处？

答：华忆除了提供国际通用书号（ISBN）之外，还为每本书向美国国会图书馆申领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英文全称：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 Number，缩写：LCCN）。绝大多数美国华文出版社要么没这个资质，要么没这个知识和能力。

问：这个编目号码有什么用？

答：凡是进入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的中文图书，都会成为美国其他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采购中文书的参考。在前十名美国华文出版社中，只有美国南方出版社偶尔能申领到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编目号，但是这家出版社面向的是国外华人，所以它的收费很高（380页以内的书起价1500美元），而且它只出文艺书籍（小说、诗文）。更重要的是，它无法满足作者对纸质书的需求。也就是说，你如果想多买几本自己的书，它办不到。

问：这么说，你们华忆能满足客户对纸质书的需求？

答：答案是肯定的。这是华忆胜出所有海外华文出版机构的地方。因为华忆具有申领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的资质，同时又是双语（中英文）出版社，所以国内出版机构多愿与之合作。合作者或希望通过华忆将其出版的图书进入美国国会图书馆系统，以便在国际舞台上弘扬中华文化；或希望将其出版的中文书的英译版交给华忆在海外出版，以便让他们出的书赢得更多的西方读者。这些合作伙伴足以担负华忆客户的购书需求。

得克萨斯一词来自印第安语，意为“朋友”。华忆虽远在大洋彼岸，但与国内出版界风险共担，与国内外的华文作者休戚与共。它愿为中华文化的传播与兴盛略尽绵薄。📧

华忆的信箱（Email）：RememPub@gmail.com

华忆的网站：jiyi2008.com 电话（Tel）：512-699-2700

华忆的地址：Remembering Publishing, LLC,

9600 S IH-35, C600, Austin,

TX 78748, USA

【现代化研究】



被西风吹尽

——中国现代化进程与未来

THE ROAD TO MODERNIZATION :

CHINA FROM 1911 TO 2020

楚天江 著

本书简介

研究中国百年来现代化进程,核心内容是一个民族(中华民族),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三种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四位强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中国所走的道路,面对世界潮流所作的择决,已经在无数的偶然中昭示了历史的必然。本书试图从中外文明交流和社会变革的角度,分析中国三次现代化过程演变以及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并展望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

前言

当你试图展望一个民族未来的时候，应该先探究这个民族的过去。未来画卷犹如一副五颜六色的拼图，它的碎片来自民族历史的长河。中国所处独特的地理位置及长期处于农耕文明发展阶段，使中华文明一方面饱受外来游牧民族的侵扰，另一方面来自内部的农民暴力革命此起彼伏，两种暴力交替主宰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华文明有文字记载两千多年的历史，展现了一部在封建集权社会的框架内，由暴力革命重复地、循环地改变社会的历史。周期性的暴力革命及在暴力革命中诞生的统治政权，在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文化的建设中带有很大的局限性。长期专制、封闭的社会环境使中华文明一直没有脱离文明发展的幼稚阶段，对人类、人性和社会的认知十分肤浅，尽管由于历史久而包裹着一层貌似高深的外表。暴力革命和人类文明史发展，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是无法分离的。世界文明的进程，也是和暴力革命相伴相随，但像中华文明一直由暴力革命左右社会发展，并且循环往复，在世界文明史上较为独特。

19世纪中期开始，世界科技的进步缩短了地球上时空的距离，世界文明体系有了大范围频繁交流的可能。西方文明的发展优势确立的强势地位，使西方文明很快主导了整个世界，并通过战争、贸易及思想体系传播，来争夺和瓜分世界。面对西方文明的步步紧逼和国内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1908年，依然处在农耕文明之中的中国清王朝颁布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宪法，开始追求国家现代化的转变。1911年，深受西方共和思想影响的辛亥革命，迫使延续千年帝制的大清王朝退出历史舞台。中国没有选择君主立宪制，而是选择了资本主义共和制，成立了中华民国，开始了从枪杆子到投票箱的转变。但转型之时的国家结构并不稳定，从军阀混战时代很快过度到国民党一党独大，接下来是两雄相争的国共大决战，中国政权又实现了从投票箱到枪杆子的轮回。1949年，同样受西方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其说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还不如说枪杆子选择了社会主义，或者说是拿枪的人选择了社会主义。一百多年来，中国在战争和社会动荡中经历了两次现代化革命，部分完成或正在完成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这个进程是如此的漫长，以至于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尽管现代化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尽管中国民众已在同步分享世界科技进步的成果，尽管北京、上海已迫不及待显示比肩纽约、伦敦、

巴黎的勇气，但是，我们还不得不承认，这些仍然无法掩盖中国社会处在农业文明阶段的本质。

1989年“六四”以来，中国社会发展按照自己的轨迹走到了现在，这个结果好于当时许多悲观的预测，甚至超过了人们的预期。但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势仍然包含了太多的不确定性，任何人都会在预测的时候十分谨慎。近3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部分化解了公众对政府执政能力和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疑虑，但不断出现的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也在消磨公众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期待和耐心，这并不是由于他们已经经受过历史的欺骗，而是因为现有的政治框架和社会结构内无法找到未来的解决方案。我们发现，三十年前的普遍贫穷变成了今天巨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公平问题；三十年前的工业化不足变成今天全国性的、几乎不可逆转的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三十年前的意识形态主导社会变成今天社会价值观的普遍缺失和道德体系的崩溃；三十年前的干部腐败变成今天利益集团几乎半公开地窃取社会财富，等等不一而足。

更为重要的是，“六四”之后，贯穿中国八十年代知识界的危机感和对历史的反思，消失在一片缄默和寂静之中。如此现象令人深思，因为一个民族只有了解全面而真实的信息，才有可能做出准确的判断。一个国家某一阶段的经济成就，如果没有经过纵向（历史上）和横向（国际上）的客观比较，为了政治目的而夸大的宣传显得毫无意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知识界有一个十分流行、大家深信不疑的理论，即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两千美元的时候，民主社会将会逐步到来，因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欧洲国家，七八十年代的亚洲日本、韩国、新加坡基本如此。

2006年中国人均GDP突破2000美元了，到了2019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一万美元，但是，大家看到，我们所期望的社会民主和社会公平并没有如期而至。不仅如此，我们不但没有看到民主和公平的旗帜，反而听到文化大革命的口号和歌声在中国大地上再次出现。历史是如此的诡异，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后，习近平正在改变国家的方向，高喊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口号，头也不回地走向了毛泽东的文革之路。深圳的“发展是硬道理”被梁家河的“大学问”所取代，是所谓红色血统蒙住了他的双眼？还是因为梁家河离“革命圣地”延安更近？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宏大理论并非独创，其

衣钵不是来自延安，就是来自文革。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 E. H. 卡尔在《历史是什么？》说的：“当我们尝试回答‘历史是什么’这类问题时，我们的答案在有意无意之间反映我们在时代中所处的位置，也形成了更广阔问题的一部分答案，即我们以什么样的观点来看待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历史是什么？》（英）E. H. 卡尔著，陈恒译，89页，商务印书馆，2008）世界文明体系正在演变的格局，中国社会发展轨迹和出现的社会问题，还有逐渐披露以往不为人知的历史资料，像春风一样吹扫着过去岁月中意识形态的尘埃。历史的线条似乎越来越清晰，似乎越来越接近真相，虽然每个人看到的角度不尽相同，得出的结论也可能大相径庭。比如：

共产党常说推翻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否真的存在？

为什么在 1949 至 1979 的 30 年间，中国把帝国主义彻底赶走了，却陷于了极度贫困，而在改革开放的 40 年中，中国经济取得奇迹般发展，“帝国主义”的外资企业已占到中国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

实际上中国只有封建专制一座大山。所谓“万恶的旧社会”，是否为了强调暴力革命的合法性而将社会变革的必然阵痛人为夸大？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是否受到政治斗争的挑唆和暴力革命的绑架？因为历史证明地主阶级成为暴力革命的冤魂，他们并非农民致贫的主要原因，他们的被消灭并没有带给农民物质上的富裕。

处于同样处境的还有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历史告诉我们，随着这个群体的消失，城市里的工人和市民并没有因为不被剥削而富裕，国家经济也没有因此而走向繁荣。2019 年，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而帝国主义（外资企业）和民族资本主义（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总量中占到三分之二强。尤其在贫富差距日益加大的今天，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道理暴露出致命的逻辑错误。当年，穷人如果只是因为自身贫穷，就挺身反抗社会，以暴力手段来改变社会财富的分配模式，并称之为革命的话，而今中国社会底层的穷人是否可以同样揭竿而起，如法炮制？这些问题的追问可以解构和摧毁主导中国政治形态的逻辑，也可以让我们把握中国现代历史变化的主要脉络！尽管中国历代的政治家都把历史当作可以随意打扮的婢女，但历史会在未来找到自己的尊严，因为谎言有千万种，真相只

有一个。研究中国百年史，核心内容是一个民族（中华民族），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三种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四位强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一百多年来中国追求现代化所走的道路，中国面对世界潮流所作的选择，已经在无数的偶然中昭示了历史的必然，中国未来的答案只能在这百年历史中寻找！📌

后记

2020年是农历庚子年，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庚子年总是多灾多难。

果然，新年伊始，湖北武汉新冠肺炎大疫横行，继而肆虐全国，接着疫情全球爆发。到5月底，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病例超过600万，累计死亡人数超过37万人，为二战以来死亡人数之最。

世界各国由此展开的抗疫举措和实施效果，被中国政治家、官方媒体和御用学者解读为社会制度的对比，领袖智慧的比拼。中国和西方，一个舆论受到严格管控，一个新闻完全自由；一个国人不得妄议中央，一个任何人都可以批评总统；尤其是在中国官方媒体没有提供全面真实的信息的情况下，这种比较似乎很难做到公平。目前全球抗疫正在进行之中，此时下结论为时尚早，但中国政府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证明自己制度优越性的机会，因为三十年来一向如此。

在习近平当政后，王沪宁把持中国舆论，出动向西方出击，不计成本展开“大外宣”，美其名曰“讲好中国故事”。于是，由中国武汉肇始的新冠肺炎全球之祸，成了中国领导全球人民抗疫、传授抗疫经验和大国担当的宏大故事。虽然新冠病毒的来源有待调查和论证，但武汉疫情暴发之初各级政府部门对疫情的瞒报、推诿、欺骗和打压是显而易见的。封城初期政府准备不足、应对失据、决策失误和粗暴武断，武汉和湖北人民深受其害，全国人民有目共睹。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爆发，快速无情地扯下了中国政府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不仅彻底惊醒了中国人民虚假的强国梦、盛世梦，而且证明了100多年来中国现代化伴随的致命缺陷，尤其证明了70年来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的本质——口号是“人民至上”，实质是“政权至上”。虽然国内舆论在官方授意之下，反复强调和论证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和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但粉饰现实无济

于事，虚假吹捧毫无意义，未来历史会告诉人们真相。

经历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人都记得，1988年是中国思想解放的黄金时期，知识界、学术界都在反思华夏文明，反思中国的灾难和挫折，探求中国的发展模式。1988年我有幸考入北京一所大学读研究生。我所在的大学以思想活跃著称，每到周末，学者名人穿梭校园，精彩讲座不断上演。那时候上大学没有太多经济和就业方面的压力，虽然物质条件不算丰富，大多数学生身材瘦削，面带菜色，但精神饱满，充满激情，眼睛里闪烁着理想的光芒。教授们刚刚抚平“反右”和“文革”带来的创伤，虽然在物资上还很贫穷，但在他们眼中，你能发现一种类似宗教洗礼后的静谧。他们对民族命运的执著探索和对学生无私的关爱，让人难以忘怀。

一九八九年“六四”后，一切戛然而止，显然是暴风雨后的平静。“六四”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它真实地暴露了长期由意识形态所掩盖国家政权和人民的关系，也显露共产党改革的底线——即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地维护政权。一晃三十年过去了。三十年来，我和大多数中国老百姓一样，感受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努力在瞬息万变的社会现实中修正自己的认知构架和对未来的判断，尤其是当你的生活并没有依附某个党派、某个集团，你的生活就更接近生活的本质，你的感悟也就更加真实。如今，昔日的青年也步入中年，阅历的洞见和发福的腰围一起增长，人生的激情却和头上黑发一样日渐稀少。也就是心中残留的这一点激情，成了驱使我写作的唯一动力。十年来断断续续的思考，时快时慢的写作，终于完成了这本小书。实际上在梳理中国百年史的同时，也是对自己的人生完成了一次梳理。在此种心态之下，写作与其说是一种思考的折磨，还不如说是痛苦的享受。知识和思想带给人内心深处的愉悦，也算是一种回报。严格地说，本书不是一本历史著作，书中所罗列了史料基本属于常识范畴。作者只是试图从中外文明交流和社会变革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社会发展的脉络。因为我们知道，任何现实的问题必定有其历史的根源。想从中国百年历史的发展轨迹中理出某些头绪，想要突破历史的迷雾、思想的桎梏和思维定式的局限，是何等的艰难。

本书是一个中年人向20世纪80年代青春致敬（那一代人的青春）的产物，假如能带给其他探索者一点启示，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许多朋友无私的帮助。由于本书内容相对敏感，可能会引起北京当局不快。为了不给这些朋友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只能在此列举他们的化名，北京的祖先生、

根先生、永先生、喜先生,远在美国的肖先生、赵女士夫妇,他们毫无保留地让我分享他们的真知灼见,使我受益匪浅。尤其是肖先生,作为高中同窗,相同的志趣让我们保持了长达40年的友谊。没有他的热情帮助,此书恐怕难以在美国出版,谨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当然我也在此说明,本书所有观点均由作者负责。由于本人才疏学浅,挂一漏万,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本着文责自负的态度,望大家批评指正。

关于本书的名字,我想说明一下。辛稼轩是我喜爱的词人之一,他的一生浓缩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大部分特征。他生于南宋战乱时期的济南,此时汉人王朝已被游牧民族入侵,南北分裂。他曾两试科举不第,21岁随耿京揭竿而起,投笔从戎。26岁作《美芹十论》上书宋孝宗,31岁作《九议》上书宰相虞允文,所呈皆是救亡图存之计。后来得以归顺朝廷,进入体制内,虽官至江西、湖北安抚使,但对官场多有不适,正值盛年官场失意,42岁即赋闲在家。在他的内心深处时刻期盼着皇恩再临,东山再起,报效国家,但最终未能如愿,67岁在期盼中客死他乡。正因为如此,他赋闲之时创作的大量作品,表现了他对历史、人生和民族的思考,首次将大量有关历史及时局的思考议论引入词中,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用现在的话说,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但如果你据此推断辛稼轩只是一介书生,那就错了。在他的从军从政的生涯中,不乏铁腕治政,甚至遭人弹劾嗜杀,从另一角度印证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和多面人生。本书书名借用稼轩之词,“被西风吹尽”,对中国一百多年现代化(实际上也是西化)的曲折过程也算是一语中的,尤其是一个“被”字颇为传神,胜过千言万语。后来我干脆在每章首列上半阙稼轩词,其意其境是否切题,还在读者各自领悟。❷

2020年5月

【本书节选】

第一章 文明的冲突——失去皇帝的国家

(1911年—1912年)

一、东方古国和西方文明

在世界文明版图上,在亚洲大陆的东部,有一支起源于黄河流域的文明体系,它和世界其它文明体系,如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一样,延绵

生存了几千年。他们脚下的黄土地，面前的黄河和他们的黄皮肤，一样都是黄色的，形成了世界独特的黄色文明体系。华夏文明地域辽阔，但自然环境恶劣，可利用耕地面积较少，西面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黄河、长江从西向东，奔流而下。人口和资源的压力迫使他们形成了发达的、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在封闭的地域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成果。

让我们简要回顾中华文明的源头：到目前为止，商朝是所发现的最早有文字文物的历史朝代，大约在现在河南省境内，存在于约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1046年。商王朝已经有一个完整的国家组织形式，并且具有了奴隶主王朝的规模。北京故宫博物院和河南省博物院馆藏已出土大量精美的青铜器，向世人展示着世界东方辉煌的文明成就，也表明商代文明已经十分先进，包括令世界瞩目的冶炼技术和完整的文字—甲骨文。在英国著名学者汤因比的视野范围内，商代文明是他分类的人类历史上的第23个文明形态。（《历史研究》，汤因比著，上册，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而在公元前2600年，非洲尼罗河岸边，古代埃及人发明了莎草纸，并开始建造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在时间上要比商朝早一千多年。

商王朝之后，周王朝晚期分裂成一百多个诸侯国，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史称东周，诸侯争霸的春秋时期开始。（大约公元前753年，在欧洲的地中海，传说罗马开始建城）春秋时期社会动荡，战争不断，各小国之间几乎抑制不住用武力和暴力掠夺土地和人口，以增加自己的财富和国力。多年战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历史上先后出现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公元前356年，七雄之一的秦国国王秦孝公实施商鞅变法，社会管理效率大大提高，极大增强秦国国力。秦王赵政继位之后，野心勃发，妄图一统天下。秦王举国之力，征战数年，秦国的铁血战车驰骋华夏，铁甲战士所向披靡。公元前221年，秦王终于灭掉齐、楚、燕、赵、韩、魏等六国，建立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号称秦始皇，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土面积较大和人口较多的帝国。

秦王朝建立一整套国家行政管理体系，用郡县制取代了周朝的诸侯分封制，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并开始大力修筑道路。秦始皇成就霸业，实为一代枭雄，但他的王朝建立在血与火的刀剑之上，他的威望来自于武力征服，所以外惧征服和内疑反叛伴随了他短暂的一生，前者使他举国修筑万里长城，后者则使他违反文明规则开始“焚书坑儒”。这两者和他武力统一的手段，确定了中国历史上由

暴力和武力建立王朝，和集权专制的国家管理模式。由秦以降，中国经历了汉、三国、隋、唐、五代、宋、元、明等主要朝代，一直到公元1911年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的解体，虽然王朝的更迭时为汉族（农业文明内部），时为外夷（外来游牧民族，如辽、西夏、金、元、清等），但秦始皇开创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管理模式却持续了2000多年，没有实质性改变。

作为世界东方封闭的文明体系，中国封建社会朝代更迭交替被外来游牧民族和内部的农民暴力革命所打乱，持续不断的外族入侵和内部战乱，有如体内病毒不定期发作，导致整个社会发展在一个宿命的周期中循环。当你比较明朝（1368-1644）和汉朝（前206-公元23），清朝（1644-1911）和唐朝（618--907）的某一时期，你甚至无法准确判断那个朝代更先进、更繁华、更强盛，尽管它们之间相距近千年。在世界文明体系不断发展和演进中，各个文明体系都处于相对封闭时期，按照自己的轨迹在发展，华夏文明一直保持着农耕文明的先进地位，至少在亚洲大陆是如此。欧洲文明在公元15世纪以前并非是世界主要的文明体系，同一时期亚洲地区文明相比较而言，更为繁荣和先进，所以四大文明古国三个在亚洲大陆，一个在非洲大陆。

1644年，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建国，这个由游牧民族（满族）在农耕文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王朝，很快适应从草原到水田、从蒙古包到四合院、从部落到城镇的改变，整体继承了明朝的国家管理体系。经历了所谓“康乾盛世”的短期繁荣，社会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封闭的农业文明体系，土地至上，生产力水平低下，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劳动剩余价值较低，基本只够维持较低的生活水平。人口众多、素质低下，国家没有建立全社会性的教育体系和制度，在普通民众眼里，读书识字属于富裕人家的奢侈品，或者是有志于仕途年轻人的敲门砖。没有国家宗教，或者宗教太多，每个皇帝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宗教。虽然多教并存，佛教、道教等遍布名山大川，但对社会的影响力局限在较低的层面。从汉朝确立的儒家文化伦理，在社会上起着类似宗教的作用，它更多的强调社会等级和社会秩序，在传授统治者的管理技巧同时，也要求百姓的服从和配合。如《论语》中强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等等。

从秦朝开始实行的思想和言论控制得到了更加严格的执行。国家管理体系和管理方式一如既往,以皇帝家族为首的国家管理集团控制一切,官僚体制靠公开的腐败来维持正常运行。经济是社会的基础,土地问题是农业文明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农业社会的发展模式效率低下,是属于人类文明的低级形式,它只能是解决人们基本生存问题,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繁荣主要依靠气象因素,如果连续三年大旱无收,或大涝欠收,就会因为粮食短缺爆发社会危机和动荡。当粮食丰收、物资充足,能够满足人口的基本需求,那么社会总体上就表现得繁荣稳定。历代中央政府采用赋税手段来调节社会土地矛盾,当社会贫富严重不均,土地越来越集中在皇族、官僚和大地主的手里,一旦出现自然灾害原因,粮食无法满足人口基本生存需求的时候,社会矛盾就会突然爆发,社会就会出现周期性动荡。因为社会结构决定了社会矛盾无法化解,历史上暴乱不断,但所发生的暴乱还称不上是社会革命,因为所有的暴乱无关乎社会制度,只和权力争夺及财富分配有关。

清朝立国 200 年前后,也就是到了 19 世纪中期,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前夕,中华文明再次面对外来文明的撞击,这次面对的不是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如匈奴、西夏、女真、辽金、蒙古等游牧文明,而是来自遥远欧洲大陆的西方文明。本文所指的西方文明,是指发源于欧洲大陆的文明体系,包括西欧的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等国,东欧的俄罗斯帝国,(虽然西欧和东欧之间缺少认同感)以及后来建立的美国,美国的政治思想、社会形态和宗教体系从文明源头上也是来自欧洲。

西方文明在思想上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刚刚完成了工业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社会形态,也是世界文明体系唯一从封建社会自然演化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特例。他们是有备而来。物资层面他们已经丰富和先进得让农耕文明眼花缭乱,目瞪口呆;思想层面则自认为已探索到人类的终极真理而俯瞰世界,他们身上的优越感是不加掩饰的。因为其它文明系统还在黑暗和蒙昧中艰难地探索,并且对西方文明知之甚少。正如汤因比形容文明冲突中的西方人的那样,“在他们第一次登陆时,他们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前所不知的无害的水生小动物;不久他们自己显示为凶野的海怪;最后他们被证明是两栖动物,

在陆地上同在水里一样地活动。”（《历史研究》汤因比，下册，18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回顾欧洲近300年的历史，让我们来看看西方文明如何从区域性文明发展到世界性文明体系。她的强盛三部曲就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

从公元471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500年左右的欧洲历史，被西方史学家称为“中世纪”，它是古代希腊罗马文明消亡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一段历史，西方将这一时期称之为“黑暗的中世纪”，中国历史学家习惯上称之为西欧封建社会阶段。中世纪是公认的西方文明的“黑暗的时代”，实际上和中国历史相比，还不是那么“黑暗”，否则就不能解释世界文明的人性之光是如何率先刺破黑暗的。西方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统治方式和中国的封建社会有很大的区别，宗教对社会的控制程度也有较大的差异。西方的封建制度有三个历史来源，那就是古罗马帝国的遗产、基督教教义和日耳曼社会形态，它是自下而上形成的。农民依附教会或地主，地主再依附于较大的封建主，大封建主则投靠较小的“王”，国王则名义上承认皇帝的领导权，实际上对自己的领地有自主权。中世纪的西方社会生活在神权和王权的双重压迫之下，神权甚至妄图控制世俗的王权。教会成了社会的精神领袖，它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上帝成为绝对的权威。中世纪的后期，商业和海上贸易使资本主义萌芽在欧洲的意大利首先出现。城市经济的繁荣，社会出现了新的阶层，商人、作坊主和银行家等有了自己的社会要求，他们更相信个人的价值和力量，需要一场思想运动来宣讲自己的价值观念。14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的入侵，东罗马的许多学者，纷纷逃往西欧避难，他们的到来使古希腊和罗马的艺术珍品和文学、历史、哲学等书籍重归故里。此时，古希腊文明的核心价值和自由思想的社会形态，犹如黑暗中的闪电，照亮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在反教会、反专制的背景下，西欧学者打着恢复古希腊和罗马文化和艺术的旗号，文艺复兴运动由此兴起。

在文艺复兴前期，意大利彼特拉克是人文主义的鼻祖，被誉为“人文主义之父”，他第一个发出复兴古典文化的号召，提出以“人学”反对“神学”。但丁的《神曲》深刻地探索了人与神、社会与宗教关系。薄伽丘的《十日谈》以辛辣的笔触无情地批判了宗教的伪善，用嘲讽的故事揭露了神父的虚伪。法国的拉伯雷是法国文艺复兴民主派的代表，《巨人传》是一部现实与幻想交织的现实主

义作品。英国托马斯·莫尔是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也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人。1516年他用拉丁文写成的《乌托邦》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一部作品，虽然是模仿柏拉图的《理想国》，他在思考未来社会的结构和模式时，对当时社会变革的丑恶现象进行了无情的讽刺。莎士比亚是天才的戏剧家和诗人，他的作品集中地代表欧洲文艺复兴文学的最高成就，对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不过在他的作品里，同样对唯利是图的商人形象进行了揭露。莫尔和莎士比亚对新生资产阶级的嘲讽，显示了英国人对新的社会形态的保守主义倾向。人文主义者开始用研究古典文学的方法研究圣经，将圣经翻译成本民族的语言，导致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对社会的进步起到重要作用。

启蒙运动发生在十八世纪的欧洲，最初产生在英国，而后发展到法国、德国与俄国，但就其影响力来说，法国的启蒙运动最为深远。法国四大启蒙作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写下了大量名垂千古的著作。启蒙运动是一场宣扬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体系的运动，并非单纯的思想运动和文学运动，它是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反封建、反禁欲、反教会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为法国大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文艺复兴时代强调的是反禁欲主义，要求个性解放。到了十八世纪启蒙时代，人文主义思想的重点，就转移到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原则方面来。由于启蒙运动具有政治思想和革命运动的性质，因此启蒙运动的参加者不仅限于文学家。科学家牛顿的自然科学定律，英国哲学家洛克的政府学说，均有较大的影响。

启蒙思想家们在批判中提出一整套哲学理论，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如孟德斯鸠的社会哲学和三权分立、伏尔泰关于宗教和宽容的观点、狄德罗对封建专制和神学的抨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对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要求重新建立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这并非欧洲思想的一时冲动，我们可以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找到探索的源头。他们主张用政治自由对抗专制暴政，用信仰自由对抗宗教压迫，用自然神论和无神论来摧毁天主教权威和宗教偶像，提出“天赋人权”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君权神授”，反对贵族的等级特权，进而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启蒙运动，既是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斗争的继续和深化，同时也为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提供了理论准备。文艺复兴时代的反封建侧重于思想意识、伦理道德的范畴，而启

蒙运动侧重于政治制度和政权性质方面，资产阶级已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进一步要求参政权利，期望建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宗教方面，文艺复兴时期主要是揭露中世纪天主教会的虚伪，谴责修道院戕害人性的罪恶，要求进行宗教改革，废除烦琐的宗教仪式，提倡比较简便的礼仪。在启蒙运动时，由于唯物论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因此在反教会方面就比文艺复兴时期更为彻底，它已把反教会提高到自然神论和无神论的高度。他们认为，人的理性是衡量一切的尺度，不合乎人的理性的东西就没有存在的权利。他们主张传播科学知识以启迪人们的头脑，破除宗教迷信。他们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宣扬自由、平等和民主。在他们看来，封建专制制度扼杀自由思想，造成社会上的不平等和文化经济上的落后。因此，他们大力宣扬“天赋人权”，主张人民参与政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启蒙运动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思想，对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都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18世纪中叶，西方文明对大自然不断探索终于结出了硕果。以英国人瓦特改良蒸汽机为开端，引起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这就是欧洲历史上的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阶段。新的生产方式随后传到整个欧洲大陆，19世纪传到北美地区。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是一般政治革命不可比拟的，其影响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人类的现代化进程推动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蒸汽机出现之前，人类生产所需动力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进，工厂不再依河而建，城市范围得到进一步拓展，城市人口开始急剧增长，很多依赖人力与手工完成的工作，开始被机械化生产所取代。蒸汽机还开始应用于水上运输，从1770年起，苏格兰、法国和美国的发明者就在船上试验蒸汽机，此后不久，欧洲人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船舰开始游曳在世界的海洋上。

1870年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各种新技术、新发明层出不穷，并被迅速应用于工业生产领域，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当时，科学技术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电力、新交通工具和新通讯手段。1866年，德国科学家西门子制成一部发电机，到19世纪70年代，实际可用的发电机问世。从此，人类跨入了电气时代，电力开始成为补充和取代蒸汽动力的新能源。电动机的发明，实现了电能和机械能的互换，随后，电灯、电车等电气产品涌现出来，电力

工业和电器制造业迅速发展起来。19世纪80年代，以煤气和汽油为燃料的内燃机相继诞生，内燃机的发明解决了交通工具的动力驱动问题。1885年，德国人卡尔·本茨成功地制造了第一辆由内燃机驱动的汽车，随后内燃机车、远洋轮船、飞机的研发也开始得到迅速推动。内燃机的发明，还推动了石油开采业的发展和石油化工工业的产生。新能源得到大规模应用，如电力、煤炭等，直接促进了重工业的迅猛发展，大型工厂能够持续有效获得方便廉价的动力供应，进而使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方式成为可能，为今后的经济腾飞和社会发展奠定了物资基础。

从15世纪到18世纪，西方文明发生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分别解决了人与神（人文思想）、人与社会（合理的社会构架）和人与自然（生产力的突破）的问题，确立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使西方文明在随后的一百年之内突飞猛进，社会发达程度远远超过世界各大文明体系。看看19世纪初期的世界文明版图：西欧最终确立了民主和自由的终极价值，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力迅猛发展，短短50年，创造了超过有史以来人类财富的总和。当然，欧洲文明中西欧和东欧的发展极不均衡，即使是在西欧，主要国家英、法、德、意的现代化途径也不尽相同。由于传统地缘政治的原因，俄罗斯帝国始终徘徊在传统专制统治和工业化转型之间，为后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打下了伏笔。由于早期工业化生产对能源和资源的过度依赖，资本对利润最大化的贪婪，欧洲各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开始盘点世界文明不发达区域，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进行资源掠夺和文明扩张。在北美洲，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和资本主义体系建立，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按照欧洲文明的政治思想原则和国家构架建立的国家。美国国父们设计的国家构架保证了美国的发展，资本主义体系让美国这个新兴国家活力无穷，经济快速增长，综合实力让美国走出关注美洲的“门罗主义”，开始寻求世界的话语权。可怕的是，中华文明对西方文明知之甚少，甚至不屑于了解，还以为是落后文明的“蛮夷之族”，最终，这一次无法避免的文明冲突，终于打破中华文明封闭的自我循环。

二、中西方文明不完全比较

在15世纪之前，世界文明体系各安一隅，被广阔的海洋和遥远的陆地所分隔，各文明体系只有零星的交流，相互之间的了解也知之甚少。西方文明起源于地中海，壮大于欧洲大陆的海岸线，先天具有海洋文明的开放性。中华文明和其

他三大古老文明一样，起源于内河流域，也就更容易选择封闭。1298年后《马可·波罗游记》成书，这本书对中华文明发达和富裕程度的描写，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文明与财富的好奇和欲望，在欧洲风靡一时，最终引发了新航路和新大陆的探险浪潮。15世纪是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西方文明开始了第一次文明扩张，实际上地理大发现本身就是西方文明向外探索和扩张的结果。在200年之内，他们发明改造了诸如罗盘、六分仪、航海图等，三角帆和三桅帆船的制造技术，使欧洲人在复杂气候条件下进行远航的能力大大提高。1492年，当哥伦布的远航船队带着西班牙皇帝和皇后给“中国皇帝”的信函，历经千难万险到达美洲大陆，以为是踏上了印度的国土，（也不知道给“中国皇帝”的信交给谁了），哥伦布以西班牙皇帝的名义宣布对美洲大陆占领。而此时，真正的“中国皇帝”——中国明朝政府却颁布了禁海令，严禁国民出海，并举全国之力，重新修筑万里长城，以抵挡外来文明的入侵。1760年以前，欧洲列强主要领地在南、北美洲，在亚洲和非洲只拥有少数立足点，后来逐步开始控制了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和几乎整个的非洲。在北美洲，因为土著居民人口稀少，来自欧洲的移民开始整体移植了他们自己的文明形态，包括他们的语言、风俗、宗教和社会体系。西方文明完成了在世界各洲的基本布局，但此时的西方文明还没有完全的实力来挑战世界各大文明体系。

一百年来，中西方文明的碰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发展走势。要想得到更直观的分析结果，就必须把19世纪中期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发展水平做个比较。但是，比较两类不同的文明体系，无疑是学术和思想上的冒险之旅，当把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比较的时候更是如此。到19世纪，欧洲已进入工业文明，已开始大量使用蒸汽机和火车了，生产力水平已是世界前列。政治上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相比封建社会，社会进步开放，资源配置合理，生产效率高，商业发达，教育制度完善，人口素质高，个人充满活力。而中国正处在封建社会农耕文明时期，以马、牛、人力为主要动力来源，生产效率可想而知，专制集权的管理体制一成不变，社会环境僵化封闭，资源配置极不合理，缺乏基本的商业环境，没有建立国家教育制度，人口素质低下，个人生活在皇权、神权和礼教的重压之下。

让我们看看中西方文明在文化方面的差异：从艺术方面来看，欧洲经过文艺

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人性的解放使艺术上升到人类的精神表达和诠释，艺术成为人类精神探索的表现手段。按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的观念，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不管是在复杂的还是简单的情形之下，总是环境，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决定艺术品的种类。”（《艺术哲学》丹纳著，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中国的艺术停留在王公贵族的欣赏把玩及文人雅士的伤感表达。中国建筑是“木头的建筑”，建筑从形式、材料和色彩上，屈从于严格的等级制度，所以我们看到好的建筑不是属于神（庙宇）就是属于王（宫殿）。而欧洲建筑则是“石头的建筑”，已从皇宫和教堂中解放出来，我们在欧洲不光看到神的教堂、王的宫殿、贵族的城堡，还看到城市和街道。木头和石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但现在看到的建筑现状并不是材料本身的结果，而是不同的社会革命方式的遗留产物。中国的大部分建筑为内乱所毁，化为灰烬埋在地下，而欧洲的建筑虽然历经各国争霸战火的摧残，却保留在城市和古老的街道上。在音乐方面，中国的丝竹管弦在器乐构造上过于依赖物质的天然属性，如木、竹、动物皮革之类，如二胡、琵琶、笛子、扬琴等，这是农耕文明音乐的特征，因为大规模制造金属乐器需要更高的生产技术。尽管中国的编钟在古代显示了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和音律的造诣，这种珍贵的打击乐不可能大规模生产。中国音乐在和声和配器上略显单薄，旋律和曲调更多地倾向于抒发个人情感与人生感悟，如思乡、怀古、送别、爱情和友谊等，和唐诗宋词中千古名篇所表现的人文意境实在是异曲同工之妙。欧洲音乐在宗教音乐的滋养下，不但出现了制造技术更为复杂的管风琴和钢琴，并形成了以弦乐、管乐（铜管和木管）、打击乐为组合，结构复杂、宏大饱满、层次分明的交响乐队，人性的思考在音乐中突显出来，交响乐已充满人文思想和哲学关怀。根据罗曼·罗兰的观点，贝多芬的交响曲不仅仅反映了他反抗社会不公和封建等级的思想，还提前是十几年宣告高了德意志民族的觉醒。从绘画艺术来看，中国传统国画沉溺于花、鸟、鱼、虫的赏玩和寄托，如兰花、梅花代表高贵品德，竹子代表气节，老虎和鹰代表勇气等，山水则代表归隐和逃逸世俗，山水画中的人物永远只是看不清相貌和表情的小黑点，表明了中国人想逃离皇权的压迫、寄情山水，又要面对敬畏自然的压力。如明朝画家唐寅的《山路松声图》，仇英的《秋江待渡图》，米万钟的《山水图》。中国的国画主要以水墨画为主，工笔重彩由于颜料的昂贵，更多的服务

于宫廷。欧洲的油画已超越服务神学（宗教题材画）和权贵（肖像画），用人的眼光完成对社会、历史和宗教思想的表达，以及对普通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16世纪尼德兰马西斯的《钱币兑换商夫妇》，意大利莫罗尼的《裁缝师》，17世纪荷兰伦勃朗的《鲁茨像》，展示了西方社会中一个新兴阶级的发展壮大和地位的上升。所以中国国画和中国瓷器一样，不成为专家就很难辨认出它们的年代，而欧洲油画除了长盛不衰的宗教题材，从18世纪开始，画家开始面向社会和大众，他们的作品甚至可以当历史教科书来看，从里面感受到历史的瞬间。丹纳说过，“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艺术哲学》丹纳著，傅雷译，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反过来亦是如此。中国文学对风花雪月的呻吟，中国音乐对个人情感层面的关注，中国绘画对花鸟鱼虫的沉溺，实际上是对集权专制社会的逃避和趋利避害的自我保护。有什么样的土壤和气候，就会长出什么样的植被。

再看看哲学方面。哲学是一个民族的大脑，代表了一个民族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中西方文明几乎同时诞生了两个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这就是春秋时期的孔子和古希腊的柏拉图，他们有着相同的职业——老师，相同的爱好——喜欢在各个小国中旅行、游说，他们的教学方式也很相同——对学生循循善诱中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甚至有着相同的梦想——梦想有一天按照自己的思想来治理国家（他们都曾经短期为官，有国家管理经验，当然所管理的国家都很小）。他们留下的著述方式十分接近，都是以对话的形式展开，来表述其哲学和思想。孔子是“述而不作”，惜墨如金，修《诗》《书》，定《礼》《乐》，作《春秋》。其弟子编纂《论语》，记录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和教育原则，成为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柏拉图则留下了上百万字著作，包括《理想国》、《法律篇》《巴曼尼得斯篇》等，并且他的研究范围更为广泛，涉及艺术、美学、政治、逻辑、法律、心理学等。他们对自身文明系统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影响的方式和结果却有很大的差异。柏拉图成了西方哲学思想探索的鼻祖，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中世纪的奥古斯都、托马斯·杰奎那、马丁·路德，到18世纪的休谟、洛克、伏尔泰、斯宾若沙、康德、黑格尔，直到现代尼采和弗洛伊德，有一条始终没有间断的西方文明核心主线，那就是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类本身及其相互关系的探索，不管探索来自哪个方向。孔

子则成了中国的“至圣先师”，他的画像进了千家万户，并修建了无数的孔庙，受人朝拜，他的思想却被人肢解，既没有得到延续，也没有得到超越，成了文明史上一座孤独的山峰。尤其是记录他言行的《论语》，时而是君王的治国宝典，时而是君子的道德指南，时而是社会的行为规范，现在则变成了商业社会的心灵鸡汤。根据历史记载，孔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的时代，因为几乎所有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哲学和思想都出自于这个时代，涌现出了儒家、道家、法家等众多流派，以及孔子、老子、墨子、韩非子等哲学大家。这是一个神奇的无法解释的时代。此后的2000多年，中国人专心于解释这些经典片段而形成众多流派，思想本身并没有得到发展和升华。因为解释太多，各种流派争论不休，所以中国人的认知系统处于一种深奥的肤浅或整齐的混乱之中。

纵观人类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发展历程，对世界的认知来自三大知识领域，即关于社会、关于自然和人类本身。对人类自身的探索形成了西方哲学的基石，从公元前的古希腊哲学，到中世纪和神学的分离，从十八世纪形成启蒙运动到德国古典哲学空前繁荣，以及天才人物集中爆发，人性在艰难的探索中释放出来。对大自然的深入研究使西方在物理学、数学、化学、天文学、植物学等方面进步神速，到18世纪已经总结了自然世界的万有引力、能量守恒等三大定律，找到认识自然、研究自然的基点和坐标，很快建立了现代知识结构和学科体系，为改变社会发展进程的工业革命打下了知识基础。对人类社会的研究和探索使西方社会最终摆脱了黑暗的中世纪，人性超越了对自然的敬畏，对王权的崇拜，摆脱了神学的控制，最终形成了资本主义的民主和自由观念，成为西方社会的核心价值，建立了现代国家结构，并通过西方文明的逐步扩张，影响世界文明体系的发展与演变。

中国历史上对社会的研究从来没有突破专制体系和秩序等级的考量，停留在“明君贤主”的幼稚期盼，追求君、臣、民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集权专制的社会管理模式。和西方文明相比，19世纪中华文明的人性还沉睡在自然（天神）、皇帝（皇权）和礼教（儒家）的三重压迫之下。从历史资料看，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类似启蒙运动的思想探索，而且中华文明对科学技术缺乏明显的兴趣和推动，尽管中国古代科技一度领先西方文明。农耕文明时代，皇帝家族始终掌握着绝大部分生产资源和社会财富，几乎所有的能工巧匠的创造发明，都围绕着皇帝

家族的消费性需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巨大的回报，所谓“奇珍异宝”不是成了皇宫的贡品，就是成了行贿受贿的礼品。而对生产工具的发明与推广，皇帝家族既缺乏兴趣，又缺少动力。

按照世界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的观点，中国历史上有 26 项影响世界的发明。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最后成了娱乐性的鞭炮和烟花，西方人则发明了火枪，较之冷兵器具有更大的杀伤力和攻击性；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却很少用它来寻找长城外面的世界，西方人带着罗盘越过了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发现了新世界并宣布占领；中国人在北宋时期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一直到清朝，也没有建立国家全社会性质的教育制度，读书和识字依然只是富人家庭的智力投资。在欧洲，1434—1444 年间德国古腾堡印刷术的诞生，促进西方人建立了现代教育制度，普及了中小学教育，并建立了大学。总体上看，直到 19 世纪中叶，中国只是世界范围内一片古老而封闭的农业文明，在世界工业革命的大潮中，基本上没有任何贡献。

发生在 18 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带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巨大的生产力的突破，标志着人类开始了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转变的进程。和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转变不同，这一次是革命性的飞跃。伴随科技生产力的进步，是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欧洲人已经从中世纪的黑暗和神学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西方认知系统对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本身的思考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哲学的繁荣导致了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和文学艺术的繁荣，并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天才人物，形成了至今依然是人类文明史上瑰宝的杰作。即使到 21 世纪的今天，这些大师和他们的杰作仍然对其他文明系统的天才人物形成了很大的压力。最终西方文明探索出以民主和自由为核心价值，以市场经济资源配置为体系的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资繁荣，单一文明体，如英、法、德、荷、意、西、比等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有了征服和掠夺其他文明的可能。市场经济对资源的贪婪和西方文明的攻击基因，让西方文明穿着燕尾服，一手拿着世界地图，一手扛着来福枪，来到了古老的长城下面，而此时长城背后，是一个农耕文明曾经辉煌，但已开始没落的古老帝国。

三、失去皇帝的国家

19世纪，当造船技术进步使船体越来越大，续航能力越来越强，西方文明带着对东方财富的憧憬和扩张的野心，从海上来到了古老的东方文明面前，中华帝国还沉浸在千年泱泱大国的梦想当中。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惊醒了帝国的千年美梦，封闭的农耕文明遇到了喧闹的工业文明冲击，黄色土地遭遇蓝色海洋的洗礼，保守而落后的封建主义碰上了野蛮而强大的帝国主义。此时大清王朝已是岌岌可危，国土辽阔，国穷民困，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一触即发，被迫打开大门的封闭帝国对西方文明的攻击手足无措。此时，一场没有严密计划的革命——辛亥革命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引发了中国封建帝制的崩溃。

19世纪末期，在中西文明对峙和冲突中，中国落后挨打，几乎一败涂地，中国人痛则思变，感到中西文明之间的差异和优劣。体制内人士从维护统治政权角度出发，提出“师夷制夷”，体制外人士则思考国家的变革，主张以暴力革命彻底推翻由满人掌控的皇朝及帝制，建立类似法国及美国的共和政体。由于国内专制的政治环境，最早主张革命的人多数集中在海外，以留学生、华侨青年为主。在民主思潮传播的同时，国内外开始出现许多革命团体。影响较大的有兴中会、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和光复会。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其领袖孙中山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政治纲领。这其实并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纲领，其中充满了大汉人主义及对满人的仇恨，还有农耕文明对游牧民族的蔑视。孙中山的“恢复中华”并不包括鞑虏之地，即满洲，所以在孙中山的早期的革命纲领中，表现的是汉人的世界观。但孙中山提出“创立民国”，首次将国家制度的革命目标提出来，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邻国日本的崛起对中国带来强烈的刺激。1895年，中日爆发甲午海战，貌似强大的北洋水师一败涂地。1905年，日俄战争，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全军覆没。小小日本连续挑战中、俄两大帝国，竟然大获全胜，究其原因，看来好像是日本胜在君主立宪政体，胜在工业化，中俄两国则因帝制集权而败，因农业文明而败。由此中俄两国也开始了自己的社会变革（谁也无法预料，中俄两国会殊途同归，站在社会主义旗帜之下，这是后话）。迫于国际潮流和国内的压力，清朝政府终于痛下决心，准备立宪，开始派遣大臣考察欧洲各国宪政状况，选派幼童留学美国，为日后改革做好人才储备。1906年9月1日，清朝颁布了《宣示预备立宪

谕》，设立考察政治馆（后改为宪政编查馆），作为预备立宪的办事机构，进行预备立宪活动。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又名《皇权宪法》），作为今后的制宪纲领。《皇权宪法》主要是抄袭邻国日本的宪法，所做的改动是使中国皇帝，较之于日本天皇，拥有更大的权力。其主要内容是：①君主神圣不可侵犯；②君主独揽统治权；③臣民按照法律有应得的权利和义务。《皇权宪法》的颁布，表明皇帝家族所谓改革，有立宪之名，无立宪之实，并非是还权于民，确立健康的社会结构，而是不想放弃手中既有的权力，希望继续维护封建专制。国人大失所望。立宪派梦想破灭，革命派则更加坚定。但《皇权宪法》也有其历史意义，它的意义在于，2000年来中国毕竟有了第一部宪法，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概念得到了宣传，这也是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第一步。

社会转型总是十分艰难的。清政府采取立宪之策，并非主动为之，只是迫于维护政权的需要、革命运动的压力和为了拉拢立宪派，先推出立宪大纲，并于1908年8月宣布立宪以九年为期，民众对清朝立宪过程推进缓慢深感失望。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死，年幼的溥仪继位，改元“宣统”。宣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而此时大清王朝已是大厦将倾，危如累卵。1911年（旧历辛亥年），四省保路风潮兴起，湖北武昌的文学社和共进会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1911年10月9日，起义消息泄漏，当日晚上，武昌城内新军士兵，攻占楚望台军械库，打响武昌起义的第一枪。第二天，起义军占领武昌城，成立湖北军政府。武昌起义的成功，鼓舞了全国各地人民的革命斗志，全国各地革命党人纷纷起义响应，先后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清政府眼看大势已去，于1911年再次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又名《妥协宪法》），这部宪法足见清廷昏庸，在帝国大厦摇摇欲坠、四分五裂的情形下，仍然坚持确保皇权，加上颁布太晚，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最终成为清王朝灭亡的挽歌。

从历史上来看，与其说辛亥革命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统一指挥的革命运动，还不如说是一场意外事件，它既没有严密的行动计划，也没有统一的指挥系统。不过，所谓历史，就是由一系列意外事件组成的，只要意外事件符合社会发展潮流，就能成功改变历史。尽管孙中山一生致力于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但辛亥革命并非孙中山实际领导的，当时他身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还是从报纸上得知的消息。鉴于孙中山在海内外的革命威望，1911年12月29日，孙中

山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2月，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溥仪搬出了权力中心的象征-北京故宫。1912年3月11日，在孙中山的主持下，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名《五权宪法》）。五权是指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和考试权，这五权要受到国民选举权、创制权、弹劾权、复决权四权的制约，五项治权与四项政权的结合才是最理想的宪法。在中国建立一个实行议会制和责任内阁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确立新的国家模式。

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成立，宣告了历史性改变即将到来。从某种意义来讲，辛亥革命不是一次彻底的社会革命，充其量也只是一场城市革命。和世界范围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不一样，辛亥革命是由海外留学青年推动，国内军人完成的。在几乎没有资产阶级的农业文明里，进行的模仿西方文明的资产阶级革命，既没有社会基础，也没有经济基础，甚至没有文化和心理准备。共和制在中国宣告成立，确实是一抹鲜亮的曙光，但随后发生的社会变异证明了两千年的黑暗很快吞噬了这微弱的光亮。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学习和模仿共和制也需要时间。宣布成立的中华民国只是一个象征性符号，既不“共”也不“和”，没有建立权威的中央政府。孙中山没有自己的军队，也就没有权威，他甚至无法协调各方的政治力量。皇帝退位，军阀登台，原先皇帝的特权转移到掌握兵权的各地方要员手中，出现了一帮武装割据、各怀鬼胎的“土皇帝”（军阀群体）。

辛亥革命的枪声，终于使早已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轰然倒塌，在中国持续2000多年超稳定结构的封建社会缓缓而止，古老中华帝国变成了没有皇帝的国家，给各色人等带来无限的遐想。因为中国历代所谓皇族，并不像欧洲各国王室和日本的皇族，有着几百年的连绵不断的家族血统，得到了历史的传承和社会的认同。中国皇族是历史上暴力革命成王败寇的结果，每一次中国历史上失去皇帝的空缺，很快就会被经过浴血厮杀的铁腕人物来填补，其中包含中国暴力革命改朝换代的历史轨迹。如汉高祖刘邦起兵之前只是小小的亭长，宋太祖赵匡胤皇袍加身时只是一介武夫，明太祖朱元璋身世更惨，不仅当过和尚，甚至当过乞丐。当他们登上皇帝宝座之后，就会用编造的谎言和迷信来改写自己的身世，寻找“君权天授”的证据。无非是出生时“天象异常”，生为“帝王之相”，身带“五彩

之云”，实际上按他们个人的军事才能和治国才能来说，根本不需要如此煞费苦心，但在农耕文明的封闭社会中，此种招术还是行之有效的。

帝国的崩溃和皇帝的消失带来了中国社会短暂的眩昏，于是中国重演了封建时代群雄四起、军阀混战的局面。农业文明的帝王崇拜及封建国家管理体系的惯性，让手握兵权的军阀们眼前时时闪现皇袍加身的幻影。“彼可取而代之”，项籍对项梁的耳语，在中国历史上不啻是一声惊雷，震耳发聩。“成者王，败者寇”，中国历史上的至理名言，中国社会发展史的最好总结，似乎在诱惑拥兵自重的军阀铤而走险，放手一搏。“王侯将相，宁有种乎”？2000年前中国历史上最为豪迈的呼喊，时时激励着野心勃勃的农村青年人生最高目标，即每个人心中深藏的帝王之梦。国际列强既希望看到旧体制的变革，又希望保留自己的既得利益。出于对社会变革的不确定性和变革的恐惧，封建体制内人物对皇权表现出最后留恋，代表了农业文明的回光返照和对未来方向的彷徨。终于，袁世凯之流登上历史舞台。只可惜他们晚生了200年，20世纪初叶的中国已不是唐风宋雨，此时中华大地国门洞开，帝国政权土崩瓦解，西方列强虎视眈眈，仁人志士蠢蠢欲动，更为致命的是，西方文明发展经验和社会思潮如此强势，很快就占据了遭遇生存危机的中华民族的头脑，求变、求新和求强成了中华民族的全民共识。封闭的帝国一旦被迫开放，就如顺江而下的一叶扁舟，在社会革命的激流中无法把握。中国将走向何方？中华文明是否能冲破秦始皇确立的专制宿命，在开放的世界文明体系中寻找更为人性发展模式？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文明的冲突——失去皇帝的国家（1911年—1912年）

一、东方古国和西方文明 1

二、中西方文明不完全比较 9

三、失去皇帝的国家 15

第二章 中国综合症——社会变革的宿命

四、中国综合症 20

五、西方近代革命与日本明治维新 26

六、黄、蓝、红，三种社会图景 33

第三章 现代化的路径——蓝色资本主义（1911年—1949年）	
七、从孙中山到蒋介石	39
八、资本主义与现代化	45
九、政党的王朝	52
第四章 另一条道路——红色共产主义（1921年—1949年）	
十、新文化运动	57
十一、从陈独秀到毛泽东	62
十二、为什么共产主义取得胜利？	70
第五章 异化的革命——毛泽东时代（1949年—1979年）	
十三、新政权模式	76
十四、第二次现代化（1949—1979）	82
十五、革命的遗产	91
第六章 重启现代化进程——经济单向道（1979年—2020年）	
十六、重启现代化进程	97
十七、非均衡的社会裂变	105
十八、台湾现代化样本	112
十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终结	116
第七章 现代化与中国知识分子——荆棘之路	
二十、中国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	122
二十一、现代化与中国知识分子	128
二十二、迷失的语言	135
第八章 中国与世界——中国现代化的三位老师	
二十三、中外文明交流	143
二十四、中国现代化的三位老师	149
二十五、中国的未来	161
后记	172
参考文献	175

【历史研究】

云南文革史稿（上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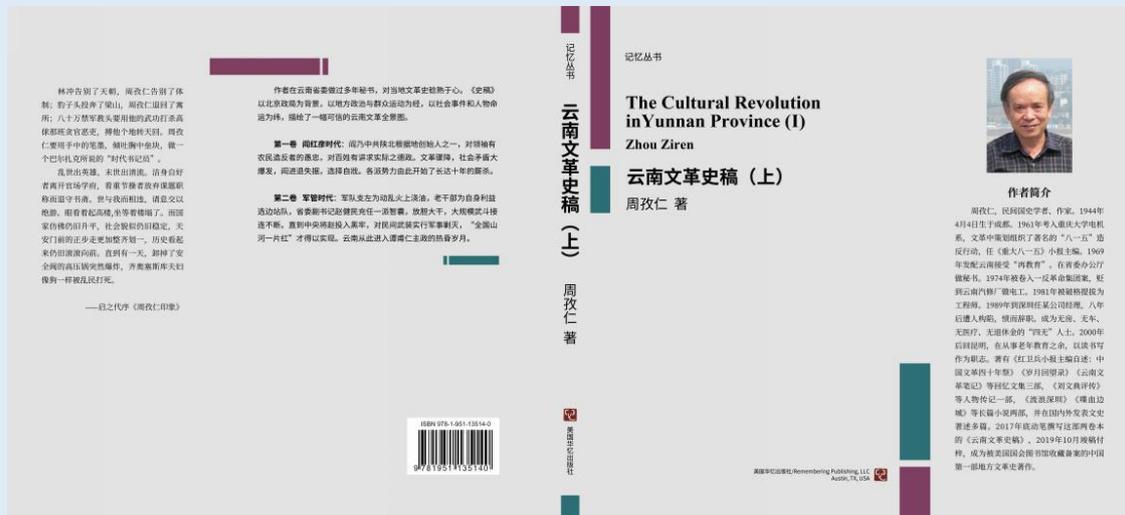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YUNNAN PROVINCE (I)

此书由原北京师大女附中

《远去的女附中》编委会捐助出版

特此致谢



内容简介

第一卷 阎红彦时代 阎乃中共陕北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对领袖有农民造反者的绝对忠诚，对同僚则睚眦必报，是为中共史上著名告密者。阎对所牧百姓有讲求实际之关怀，人颂德政；政坛混迹，他亦深谙自保与弃杀之道。文革骤降，社会矛盾总爆发，阎进退失据，最终选择自戕。已然爆发的群众暴乱由是升级，开始长达十年的生死厮杀。

第二卷 军管时代 边疆多驻军。毛泽东祭起护法神器——军队稳定局面，熟料驻滇军队矛盾重重。军队介入文革偏为纷纷乱民的仇恨火上浇油。无枝可依的老干部为自身利益计，亦选边站队。云南省委大佬赵健民病重乱投医，充任一派智囊放胆大干。群众派斗天平剧烈震荡升级，大规模武斗将云南高原拖入遍地血火

的死亡之海。直到中央大员对赵宣布“我凭四十多年的革命经验，有这个敏感，你对毛主席、对党中央、对我们有刻骨的阶级仇恨。”（康生语），将赵投入黑牢并军事剿灭民间武装谓“滇挺”者，派斗暂得消停。确保了毛泽东“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预期，云南两派斗争进入暗流涌动的冰河时代。

云南文革史稿小引

启之

这本书是中国民间出版的第三部地方文革史，是文革50周年（2016）之后，中国民间第一部克期完成的史学著作，也是文革亲历者为文革60周年（2026）贡献的第一个永久的纪念。

一

盛世修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自80年代以来，中国官方即将地方史的编写纳入社科研究的长远规划当中，1981年地方史志协会在成立。1983年由中社科领导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恢复。1986年召开了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1993年举办了地方志成果展览，展出各类志书、年鉴类著作5,000余种。成果蔚为大观。

几十年来，各地出版了成千上万册关涉文革的书籍。主要有三，一是各级党研室编写的中共地方史；二是各级方志办公室编写的志书；三是上述两个部门编写的大事记、历史纪事等。网上流传的某某地区1966年至1976年的大事记，通常是摘自党研或方志的相关书籍。

二

刘知几说过，史书有直书和曲笔两种，民间史书多直书，官史多曲笔。无论是党史还是方志，在思想观点上，“国耻袞阙，则有所避而不敢书”¹。在事实上，笼统概括，大而化之，宜粗不宜细。在写作上，叙述同质化、分析公式化、人物脸谱化、语言文件化。

这其实是盛世的必然产物。自古以来，国史、官史就多曲笔。时至明季，“国

¹ 此言出自明代史学家王世贞的《史乘考误》。耻，惭愧、羞涩、令人不安之意。“国耻”指让朝廷（皇帝）/执政者/中央高层，集体感到愧怍难言之事。袞，指的是古代帝王的礼服。借代为帝王。阙，同缺。意为过失。

史之失职”创下历史新高¹。但是伪饰失真，杜绝言路，当代更胜于朱明。我这样说，并不是说官方出的党史和方志一无可取。“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典章，述文献不可废也²”。上述史志都有文献价值。一般来说，中共地方史较地方简史详细。省志中的分志，如政党治、政权志、军事志、文化志等，会有关于文革的内容。而县志、区志、乡志、镇志中的原始资料可能会更多。

在地方史的队伍里，高校和科研院所是一重镇。据我所知，有的高校教师已经完成了本省的文革史著作，但只能藏之硬盘，留于后世。如果把地方史作为研究课题，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从搜集资料到写作，从立意到成果的发表，都会受到官方的干预和限制。因此，其学术性会大大减色。尽管如此，其相关著述仍有力地推动了地方文革的研究，其成果理应受到高度的重视。而自“新时代”以降，高校的文革研究队伍迅速走向衰亡。能够坚守下来的，只有那些在欧美澳留学的华裔学生。

2016年4月，科隆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召开“中国地方文革史国际研讨会”，与会的中国学者18人。主办方的德国教授文浩是山东文革史专家。这个会议更深刻地见证了“文革在中国，文革研究在国外”的现实。文革是人类共同的负面遗产，西方人的研究成果，中国也可以受惠。中国学界在文革研究上的断档，将来总可以接续，但亲历者在历史言说上的缺席，则将无法弥补——如果我们这一代放弃对文革史的搜集整理编纂和研究，那么，历史见证人的现场感，就会与很多文献资料一起永远消失。中国一向主张争气，而在人文社科的研究上，最不争气。落后源于愚昧，掩盖历史就是制造愚昧。

中国要有自己的地方文革史。这是科隆会议给我的最大启示。这一工程历史地落在了民间，落在了文革亲历者身上。

三

民间的文革研究者在地理上可分两类。一类是移民国外的，一类是尚在国内的。思想上，这些人又可分三种：非主流的独立学者，主流的写作者，以及游移在这两者之间的人们。年龄上，这些人的主体是大学老五届和中学老三届。他们是文革的亲历者，对回首往事，还原真相，评说历史、褒贬人物有着较高的热情。

¹ “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王世贞：《史乘考误》前言，《弇山堂别集》卷20。

² 王世贞，同上。

而当年参加过造反，又被官方以“三种人”的罪名加以整肃的人们则表现出更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这种身份的、思想上的差异和年龄上的特点，使他们笔下的文革色彩纷呈。观点上的分歧自不必说，就是在体裁写法上，也是百花齐放。有邢野式的通志体，有水陆州、刘朝驹式的纪事本末体；有要宝钟式的章回体，有赵瑜式的纪实文学。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没有受到过正规的学术训练，加上“三无一压”¹的政治环境，官方档案的封锁，民间搜集资料的艰难，使民间难以出现严谨的、完整的、符合学术规范的地方文革史著作，散漫的、零碎的、回忆性、纪实性的文字成为主流。但是，不受当下意识形态的束缚，“肆情奋笔，无所阿容”（刘知几），则为民间撰史者独有的优势。

民间要产生严谨的、完整的文革史著作，编撰者需要具备六个条件，第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坚卓的意志和无私的奉献精神；第二，才学识胆；第三，广泛的人脉；第四，好身体，第五，收入稳定，家境尚可（可以支付搜集资料、录音采访、复印打印以及相关费用）；第六，家人支持，至少不反对。

这六条，前三条是精神，后三条是物质。本书作者周孜仁先生在精神意志上比之常人绰绰有余，但在物质上，除了身体值得骄傲，其余两条都严重亏损。但是，他如期且出色地完成了云南文革史的研究和写作。

四

民间修史者最显著的特点，是下笔滔滔，动辄百万言。就结构而言，这些书大体由三大块组成，一块是叙事，一块是议论，一块是摘引资料。

先说讲史。民间史家一般都没有经过文科的写作训练，详略得当，文字省净这样的评语很难用在他们身上。他们的叙述常常会重复，文字也不免烦冗累赘。这恐怕与写作者的年纪有关——他们把老年人的唠叨带进了书里。

关于议论。经历了毛时代七死八活的折腾，作者们的胸中都沉郁了比山高，比海深的感想和思绪。一旦自由书写，就上溯国际共运，下陈时代疮痍，深究马

¹ “三无”指的是无资金（没有研究经费，没有出书补贴）；无平台（没有公开的刊物发表，没有专业的会议讨论，没有地方展示成果，评比优劣）；无出口（作品在国内无法出版）。“一压”指的是政府对民间文革研究的打压。

列，对照党史，评陟事件，月旦人物，满腔的疑问和悲愤，化作万语千言，如山洪暴发，如百川灌河。这里面有深刻入微的观察，有启人心智的反思，有令人莞尔的嘲讽，也有庸常的牢骚和老生常谈的感慨。

修史要史论结合。我看到的议论，大抵有两种，一种是脱离了史实的宏论，纵横古今，驰骋中外。让你仿佛身处“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另一种是结合事件人物，加以分析和评点。评析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从这部云南文革史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在这方面的不懈努力和良苦用心。

叙事要言而有据，因此，编撰者要有傅斯年所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坚毅与辛苦。找到之后，又有一个如何选择史料，概括提炼的问题。民间修史者的一个共性是，取材广泛深入，使用粗放疏阔。多数编撰者有一种心理：一是以为证据越多越好，二是材料来之不易，舍不得剪裁删汰。所以，他们书里总会充斥着大段的，甚至整篇的引文。《三国志》叙事简洁（白寿彝），是因为陈寿于史料有高度的概括。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取材精审”（陈寅恪），是因为他善于从庞杂的史料中选取最有用的东西。写“三国”的书多了，为什么只有陈寿的书留下来？写哲学史的多了，为什么冯友兰的书见重于世？本书作者在这方面是下了大功夫的，其书初稿64万字，定稿56万字，作者删掉了8万字。没有求精求专的精神，这是很难办到的。

民间修史的长处是“征是非、消讳忌”。直书其事，无所阿容。短处是“鸱张其臆”“杂散无统”“未足尽凭”¹。此书扬长避短，作者尽可能地占有资料，采访数十位当事人，每次与我通电，说的都是他又发掘出什么新史料，采访了哪位亲历者，什么人答应把未刊稿或自印书送给他，什么人给他提了意见等，兴奋得好像中了大奖。

下了这番功夫，此书所述历史就有了令人信服的资本。一般认为，驻扎在云南的十四军和五十四军相处和谐，没有仇冤。作者用事实纠正了这种说法：这两支驻军的关系实际上是先好后坏，最后成了仇人冤家。这就是地方史的意义，它不但可以纠正官史的谬见，还可以纠正文献的误植。

五

¹ 王世贞，同上。

刘知几有言：“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¹。”单少杰说：“中国史学‘双肩挑’：左边肩膀挑着史实；右边肩膀挑着公正，故多有人物褒贬。传统中国史书比较注重采写政治方面史料，既对之作如实记述，又对之作善恶褒贬，从而对那些政治权势人物至少形成两方面压力：一是成就压力，怕被史书写成一个碌碌无为的人；二是道德压力，怕被史书写成一个品行卑劣的人，既使自己留下恶名，又使子孙蒙受耻辱。”²我想补充的是，这种“双肩挑”官史与民史不同。官家修史多曲笔，“国史人恣而善蔽真”，民间修史“仗气直书，不避强御”。直书产生实录，“令贼臣逆子惧”。曲笔制造诬书，“使忠臣义士羞”（刘知几）。“直书与曲笔的对立之所以成为史家的撰述原则，因为它从根本上决定史书的价值和命运³。”

此书是直书实录的典范。它以封疆大吏的执政为经，以毛时代的政治为纬。知其人而论其世。对众多历史人物的事迹行状和道德人品，做了可圈可点的分析和评价，发挥了历史学惩恶扬善的道德教化作用。“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这种教育作用，不但对为政者有益，对那些为虎作伥者，如胡乔木、邓立群、袁木、蔡奇、贾磊磊等大小丑类是一种道德震慑，让他们知道自己在历史上的位置。

六

上面说的是此书的优胜处，下面说此书的问题。

此书的最大的缺点，是对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满足于过程性的描述和浅表的分析，而缺乏理论性的研判和思考。

毛时代的官员往往既是服从者又是非议者，既是受害人又是加害人。这就给评价人物带来了难题，这是对作者的史识的挑战和考验。阎红彦有施惠于民的德政，也有诱过于人的恶行。“一个体恤民意，连吃饭、盖被子、用筷子都关注入微的清官暖吏，为何一到文革顷刻变脸，成了蛮不讲理、文过饰非，草菅人命的酷官恶吏？”作者认为：“（这是由于）革命者与技术官僚品格之巨大差异也。

¹ 《史通·曲笔》。

² 单少杰：《毛泽东执政春秋》附录，页595—604。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

³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页130，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革命者造反，只关心对真理的价值追求，为此可舍弃一切，包括生命；而一旦掌权，需要的只是官场技巧，关心的只有生存利益的成本计算、风险和收益之间的选择，为此可舍弃真理。如果说阎红彦初到云南，尚存几分革命时期的善恶之念，那么经过1960年代的折腾，已修炼得日臻老道，在风高浪急的文革大海，这个云南‘船长’为一己之安全，自然毫不犹豫将可能造成威胁的人扔去大海喂鱼。”

“革命者与技术官僚品格之巨大差异”，这一普适而空泛的说法，用在阎红彦身上，首先脱离了实际——1959年阎到云南时，看到的是三农凋敝，饿殍遍野。1966年文革，看到的是反修防修和《五一六通知》。一个是触目惊心的现实，一个是云山雾罩的意识形态。饿死人的原因明摆着，调整农业政策，纠正激进极左的恶果，阎可以做到。反修防修是中共的理论迷局，连核心层的务实派都昏昏然举手赞成，怎么能要求阎红彦不跟着盲打瞎撞？抛出同僚，拿文化界开刀，批判本地区的“三家村”，在文革之初，是各省市领导集团不约而同地选项。独独苛求于阎红彦无良无德，是否公允？

再者，阎所整肃的同僚和高校领导，是“反党分子”，而不是饿得半死的农民。对前者来说，他们得到的只是降级降职和挨批挨斗；对后者来说，他们面临的是死亡的威胁。这两者在普通心理和道德天平上孰轻孰重？

因之，作者对阎红彦成为“清官暖吏”的解读，也值得商榷。阎到云南救灾施政的时间是1960年到1961年秋。这期间正是中共务实派努力走出“庐山会议”反右倾的阴影，准备政策调整的前夜。用作者的话说，也正是毛知道“大跃进惹下大祸，需要有人替他擦屁股”的时间。因此，把阎“初到云南，尚存几分革命时期的善恶之念”说成是阎成为“清官暖吏”的原因，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环境。同理，把阎变成“酷官恶吏”的成因，说成是“舍弃真理”后的“官场技巧”，也是皮相之谈。

这种分析解读，也给作者对阎的评价带来了无法自圆的后果。既然阎“经过1960年代的折腾，已修炼得日臻老道。”“关心的只有生存利益的成本计算、风险和收益之间的选择”。那么，他为什么还要自杀？难道生命不是最大的成本，活着才会有最高的收益吗？

作为党性与人性的混合物，阎与很多官员一样，在环境宽松时，是“清官暖吏”，在政治严苛时是“酷官恶吏”。这种角色的转换是形势使然。即使在后毛

时代，官员们的集体变脸，也屡见不鲜。用革命者还是技术官僚之间的“巨大差异”来解释这种现象，是说不通的。

这里还涉及作者对阎自杀的评价。在受到造反派侮辱性批斗后，阎躲了起来。1967年1月8日晚上，陈伯达、江青给他打电话，命令他见群众。阎写下“我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纸条之后，吞服眠尔通，决然辞世。

对此，作者做了这样一番评论：“其实，作为一个共产党的政治家，面对曾经多次发生在无辜者身上的冤屈，他本来应该变得圆通油滑，厚脸皮。退一步说，如果读过历史，对中国的宫廷政治有点常识，贬黜、流放，后来又时来运转，重归庙堂，这样的例子一点都不稀奇。可惜阎红彦恰恰缺乏这一点。他刚愎倔强的性格，长期身居高位而已经固化的病态自尊，还有领袖对他特殊的恩宠，使他过分倔强的自尊心不愿意再去面对草民们的羞辱。他崩溃了。”

在作者看来，阎大可不必自杀——作为对党内冤屈屡见不鲜的资深高干，他满可以厚着脸皮活下去。而阎之所以选择了死，是因为他没有宫廷政治的常识，缺乏等待时来运转的定力和重归庙堂的决心。而真正促使阎放弃生命的，是他“刚愎倔强的性格”“固化的病态自尊”。显然，在作者眼里，阎之自杀是不明智的，是不值得同情的。

这里的问题是，我们用什么标准来评价中共建政后，尤其是文革时期的自杀者和苟活者？在我看来，站在人道的立场上，无论自杀还是苟活，都值得同情与尊重。两者之间，有性格、心理的刚柔强弱之分，没有道德、心灵的高下美丑之别。能够在文革中“厚脸皮”活下去的人，无论官员、学者、艺术家、走资派、黑五类，还是升斗小民，每个人的心灵都伤痕累累，每个家庭都有一本血泪斑斑，难对人言的屈辱史。他们的生命是用忍辱含垢换来的。我们没有理由，更没有资格指责那些“厚脸皮”活下来的人。

人世间，最可宝贵的是生命。选择自杀是以一死而维护做人之尊严。毛时代许多人选择自杀，周小舟、翦伯赞、傅雷、老舍、顾圣婴等无数人选择自杀，多因承受不了人格的侮辱。作者告诉我们：“德宏州副州长雷春国，造反派给他戴上‘反革命’的高帽子……抄家、游街、批斗无所不用其极。”这位当年追随中共的景颇族山官“不堪忍受侮辱，带领全家四人一起服毒自杀。”云南大学副校长，著名作家李广田在劳改队，“遭受批斗两年余，终于挺不住，1968年11月

2日，对人道‘士可杀，不可辱’，遂匿遁至大学附近的莲花池，自蹈清波而歿。”

“士可杀，不可辱”，难道“官可杀，又可辱”？对因迫害而自杀的人不能搞“双重标准”。站在人道的立场上，我们应该做的，是给以“固化的病态的，过于倔强的自尊”以理解和尊重。站在启蒙的立场上，我们应该高尚其固化，推崇其倔强。唯如此，才能唤醒人们去改变这种不把人当人的思想体系和政治制度。

陈伯达、江青贯彻毛的思想和政策，命令阎去见群众。而所谓见群众，就是身体受残害，人格被侮辱。毛迷信群众运动，将其美化、神化、高尚化、万能化。在毛看来，干部只有通过斗批，才能得到改造和净化。这是一种错觉，一种幻想。经过斗批的干部，增加的不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而是对造反派的仇恨和打击报复的心理。毛的这一想法，是以侮辱人格为基础的。在毛看来，坐坐喷气式，戴戴高帽子，游游街，示示众是小菜一碟。换句话说，只有厚脸皮，忍受得了侮辱和冤枉的干部，才是好干部。阎之自杀，是对文革打手陈伯达、江青的控诉。客观上，也是对毛，对文革，对暴民政治的反抗。

七

此书的第二个问题，是以文害义。“言之无文，行之弗远”。但是，史学与文学对文的要求不同。前者首先要求表达清通，用词准确、行文简洁，结构规范。生动性、趣味性、可读性是第二位的。文学不一样，它要求叙事一波三折，结构跳跃变化，富有弹性，用词含蓄多义，留有想象空间。作者在小说散文，人物传记上技熟艺高，成果斐然。如今写起历史来，尽管努力克制，还是免不了把文学创作的习惯带进来。举两个例子，先说结构性的——书中说，昆明东风百货大楼是战略要地，被“八派”占领。“炮派”要拔掉这颗钉子。19日发动总攻。作者引用当时的小报，描述战斗如何激烈，子弹如何横飞，将士如何沉着冷静。当“炮派”占领东风百货之后，作者借一亲历者之口，讲述了战斗的真实情况，说明小报所言全是一派胡编。亲历者讲完之后，作者又讲了另一个故事：18日清晨，一位援越军人在百货大楼附近被打死，尸体落在“炮派”手里，没有尸检报告，死者是哪派打死的至今仍旧是谜。而从开枪的方向上看，子弹应该来自“炮派”一方。据作者推测，“炮派”之所以不公布尸检结果，就是要把打死人的责任推给“八派”。以便为19日攻打百货大楼提供借口。

这两个故事，在作者笔下一波三折。可是读者却不免犯晕——为什么不按照时间顺序，先说18日的军人之死，再讲19日的假激战呢？是不是作者沉迷于战斗的故事性和事件的神秘感，而忽略了事情的因果和叙述的先后？

以文害义，更多地表现在作者对事物的描述上。作者称阎红彦是得到毛之恩宠的封疆大吏。可阎死后，作者又说：“对于北京当局，阎红彦的死似乎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寻常小事。文革中死的大人物太多，区区边疆小吏，实在算不得什么。”可是作者接着又告诉我们，周恩来如何速派专机送法医到昆明验尸，如何指示昆明军区的领导和造反派代表来京汇报，如何又给云南当局发来六条指示。如此叙事，倒是很有点起伏跌宕了。可矛盾却出来了——既然阎之死“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寻常小事”，周恩来为什么要如此重视？

此书的第三个问题是对史料的选择和提炼。前面说过，民间修史者有一个共同的心理：一是以为证据越多越好，二是舍不得剪裁删汰。作者将此书删汰了8万字，其求精求专的精神殊为可贵。但是，如果高标准，严要求，此书在这方面还有提升空间。众所周知，文革是一个假话空话大话套话车轱辘话充斥的时代，因此，在摘引资料时，就要精心选择，让所摘引既能说明问题，又能避免冗赘雷同。此书写到“炮派”占领了下关之后，在两天内连发了三份通告。作者将这三份大同小异的公告全搬到书里。实际上，有了第三份公告就足以说明问题。

如何既保存史料的完整，又避免内容的重复和行文的板滞。《北京大学文革史权》的编纂方法值得借鉴——他们将史著与史料分为两部分，史料作为史书的补充和附录，分门别类单独汇编成书。这样，既可以为史著提供所需的文献，又可以将这些宝贵的文献资料保存下来。

八

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力安有言：“研究国史和地方史的目的，不是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而是存史、资政、育人。”¹ 这部得不到当局认可的《云南文革史稿》在“存史、资政、育人”方面，填补了党史方志的空白，揭示了曲笔的掩盖和伪饰，纠正了官史的不实之词。它用真实与良知，证明着自己的学术价值和文化含量。

¹ 这是2000年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史工作研讨会”上，李力安发言中的话。

当然，这只能是一种遥远而滞后的证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本书和它的作者，都不会为国人所知。此书会在国外网站上销售，会被欧美大学东亚系收藏，会成为汉学家的读物。同时，这本书也会引起国安的不安，作者可能会“喝茶”，被管制，被禁止出国参会讲学。民间史学成果在“新时代”的文网之中将被软埋雪藏。而中国的年轻一代在接受“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等虚假说辞的同时¹，则将长久地生活在蒙昧之中，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纵情高歌。📌

2019-12-25，圣诞之夜

导 言

历史书记员的心愿

云南作为边疆省，自古以来，距离中国的政治中心一直显得很遥远。著名的昆明大观楼长联作者、清代诗人孙髯，联中论及滇史，曾引“宋挥玉斧”一典，其意盖云，宋太祖赵匡胤得天下后，曾拔下绾发的玉斧在地舆图沿大渡河一划，称“此外非吾所有也”，其后150年西南疆果然鲜有边患。元明以降，虽然中央政权驻军屯垦，官吏由“土官”改为“流官”（所谓“改土归流”），逐渐强化了对云南的统治，但毕竟山河阻隔，云南的社会、政治、经济一直与全国的政权中心关系都相对疏离，直到上世纪50年代，用铁血手段建立的中共中央政府才终得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

事虽如此，由于历史和地域的原因，云南的经济、文化总是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其丰歉治乱，对全国没有什么大的影响。直到1965年1月，第一条“通向国内”的铁路“贵昆线”才正式开通（原来仅有一条俗谚“云南十八怪”之一的“不通国内通国外”的滇越“米轨铁路”和一条更窄的“吋轨铁路”从锡城个旧通至盛产豆腐的石屏县）。昆明机床厂（前身为抗战时期建立的中央机器厂）曾被誉为“全国八大机床厂”之一，其拳头产品“坐标镗床”销往内地，尚需绕道越南，从海防港转运广西再入境中国。据统计，1966年云南的工农业总产值

¹ 习近平：《2014年9月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页220，2019年5月31日印发。

47.5 亿元，仅占全国的 1.87%；财政收入 5.4 亿元，仅占全国的 0.97%还少¹。

经济的落后毫不影响北京强大的政治辐射力和行政管理效率。老百姓说：北京打个喷嚏，云南就感冒。更何况伟大领袖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完全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瘟疫，云南虽山河遥远，焉能抵挡得了？

1977 年 3 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接见云南主要领导时说，“云南是受林彪、‘四人帮’破坏的重灾区”。²此话不假。1966 年到 1976 年，云南动乱的疯狂性、斗争的残酷性，群众间你死我活的仇讎厮杀，绝不亚于其他省区，以至更有甚之。文革十年，三任半省委书记，二人凶死（阎红彦自杀，谭甫仁被暗杀），一人郁郁而终（周兴在全省动乱，尤其是滇南沙甸的军民武装大杀戮一个多月后郁郁而终），贾启允被邓小平点将临危受命，可惜不满一年，即在批邓风潮中“变节”而于 1976 年 10 月的风云突变后黯然落马。

云南的两大派群众，十年间一直在政治博弈中翻烧饼：先是恶斗三年，其中一派因“路线正确”掌权 7 年。另一派落败，被“新生红色政权”以“划线战队”为由，被“群众专政”，造成冤假错案 15,000 余件，打伤致残 6.1 万多人，迫害致死 1.7 万多人³。手握大权这一派曾经很自豪，说全国真正由造反派掌权的，除了上海，就只有云南了。1976 年 10 月政变，“四人帮”垮台，云南政局重新洗牌，过去惨败的一派上台，完全掌握了对另一派的罪责追溯权。这一次，他们名正言顺地以国家的名义对失败者进行大规模的“揭、批、查”。

据《当代云南大事纪实》载，全省共清查“重大事件”1816 起，全省进入县以上机关的另一派群众代表，定为“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共 7,659 人，分别被关押、审查、批斗。民间资料提供的数据则要大得多，据 2017 年 3 月 10 日原省妇联主任包亚芳等全省 14 个州市上访代表 88 人（均为入狱刑满的原群众组织领袖）写给中央第 11 巡视组组长徐令义的申述报告⁴统计：“云南全省受到审查、批斗，办各种‘学习班’共 150 多万人，判刑入狱的五万多人，判死刑二人。在整党‘清理三种人’中，受到党纪、政纪、开除公职、

¹ 当代云南大事纪要编委会编：《当代云南大事纪要》1966 年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当时全国的经济总量，工农业总产值为 2534 亿元，财政收入为 558.7 亿元。

²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办：《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页 418。

³ 《当代云南大事纪要》页 371。

⁴ 共有 14 个州市 88 名代表实名签字。

劳动教养、无故清退回家等15万人。在审查期间，刑讯逼供打死、逼死、逼疯1,000多人。”对于主要的群众领袖，都进行了公开的“正义的审判”。时过境迁，当年的荒诞激情与残忍互害早已烟消火灭，死难者的断碣残碑都付与了苍烟落照，幸存的风云人物则已风烛残年，只能在窘困的生活和不断上访中消磨最后的生命。

文革结束40余年后的今天，云南的掌权者已经换了一茬又一茬，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改革进入深水区。文革的悲剧让人们对于政治实用主义的虚假和主义的真伪了然于心。云南几千年淳朴的民风不复存在，激情岁月的信念和理想亦随风远逝，唯有物质主义成了最为现实亦最为诱人的奶酪。于是，短短几十年，云南就有了全国闻名的“塌方式”倒台——白恩培、高严、李嘉廷、仇和、孔垂柱、沈培平、高劲松等贪官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与广大民众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¹

执政当局自己的头疼事多着呢，哪有工夫考虑他们那些陈谷子烂芝麻。云南当年的草民英雄，他们的问题本来就是历史酿成的，也就只能让历史去遗忘与评说了，说得再具体一点，只有等待自然规律去彻底了断他们的诉求。

钱穆先生有云：治史者和读史者，都当有“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国史大纲》序言）。云南文革的血腥、残忍与荒唐，让人萌生的唯冷峻与警觉而已。作为历史的书记员，为让记录更客观准确，笔者力图在时间坐标上离得更远一些，以使情绪保持平和与理性，尽其所能将发生在云南这一时段复杂惊悚的故事抢救出来，记录下来，留给后世解读与评说。让未来人不再如我辈研治古史那样，去寻觅遥远的墓穴与废墟，于破砖碎瓦、断简残篇中寻找可靠的信息。我相信，历史法庭迟早要对这一段岁月的荒诞、血腥和罪恶进行公开的审判，本书如能为未来的孩子们提供可信的证词，则吾愿足矣。📖

¹ 白恩培，曾任云南省委书记十年，2006年以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并处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高严，曾任云南省委书记。2002年负罪潜逃。2003年11月被开除党籍、公职，为外逃官员中级别最高者，至今未上国家“红通”，更未缉拿归案。李嘉廷，曾任云南省长，2001年因贪污受贿罪被判处死缓。仇和，曾任云南省委副书记，2016年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孔垂柱，曾任云南省副省长，2014年3月，接受调查期间查出艾滋病自杀。沈培平曾任孔垂柱秘书，后为云南省副省长。2015年，沈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高劲松，曾任昆明市委书记，2017年，因犯受贿罪、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本书节选】

第七章 云南第一次大武斗

7.6. 武斗时期的社会生活

两派大武斗，市民百姓是无辜的牺牲品。

除了漫天乱射的子弹不长眼睛，对任何局外人的生命都会构成威胁，还有武斗导致的交通中断，使生活用品的运输都陷于停顿，特别是须臾不可或缺的粮食。为了解决昆明的粮食供应，云南省军管会不断组织汽车运输队到滇西、滇南等地运输粮食，以保证昆明的粮食供给。

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首先得保证手握武器的“革命群众”吃饭。据资料记载，云南大学总务处在此前就购进20多万斤粮食以备不时之需。武斗开始后，云大三分之二师生逃离学校，同时却住进一万多工人。他们大多是被“八派”赶出来的，既是“炮派”武斗的主力军，还是武装保卫云南大学的生力军，每天至少需要一万斤粮食。怎么办？反正手上有枪，只有想办法去抢。

9月下旬，眼见得云大存粮消耗殆尽。忽得省粮食厅“炮派”人士传来可靠情报：有一列米轨小火车将从禄丰方向送粮食来昆明。“炮派”指挥部闻风而动，派出200多辆卡车到西站的麻园车站堵截。从云大后门到麻园车站两公里左右。为掩护搬运粮食的车队和人员，校武装部郭大尉派武装力量参与保卫工作。

这是一列由省军管会组织的从滇西运粮到昆明来的火车，火车上全是一袋袋的大米和小麦。“炮派”武斗队伍刚在麻园车站布置好警戒，还不过十分钟，列车就鸣着汽笛进站了。火车一进站就被堵下，几百名动作麻利的“炮派”工人迅速把粮袋运上卡车，装满粮食的卡车马上驶走，另外的空车源源不断地靠上来。抢劫行动总共在车站花费时间仅一小时左右，接着指挥官便发出撤回警戒信号——手枪对空鸣三响。最后一辆满载粮食的汽车喜洋洋返回云大，食堂仓库装不下，就放去物理馆、生物馆的教室。负责指挥该次行动的“炮派”常委杨凯想必太兴奋，不慎手枪走火，打伤了自己的手臂，其他一切皆顺，仿佛这列火车是专为“炮派”送粮来的。

据官修史书《云南省志·卷首·大事记》载，麻园劫粮两个月后的11月22日，“昆明两派武斗持续升级。其中一派为了占领仓库，控制粮食，强行进入军

管的昆明市粮食局第一直属库，将守护仓库的装卸公司一名工人杀死。将仓库护粮人员七人打伤，其他仓库职工则逃命跑了，而直接强占仓库的造反派头头反诬陷仓库职工及市粮局党委负责人是‘关仓停粮，逼民造反’，组织队伍到市中心游行闹事。是为‘11.22’事件。1969年“划线站队”时，将此事定为全省重大反革命事件之一。”

从云南官方文革史一贯的叙事语境判断，武装冲进粮库应指“炮派”，而以此发起政治攻势的是“八派”。几十年后，再来审理其是非已毫无意义。但由此可见，当一个社会失去了秩序，缺损了政府的权威，而任由武装集团胡作非为，普通的群众将会落入何等无助的可怜境地。在上述简短文字记录背后，我们可以想见昆明市民米缸空空，老人和孩子嗷嗷待哺，而满眼只见伟大领袖的画像和捍卫革命理想的旗帜乱舞，那是多么残酷而滑稽的画面！

文化大革命以最崇高、最神圣的名义发动，可武斗一开，整个社会却变成了最野蛮的人间丛林，“有枪便是草头王”。苦则苦煞了市民百姓。不管有心无力的“维持会”（军管会）如何努力，各粮站依旧大米紧缺，按规定只能供应给市民20%的杂粮，有时甚至只能配给苞谷粒。当时昆明街头广传一条顺口溜，道尽了百姓的无奈：

八爷爷，炮奶奶，请听市民诉苦来。
家已断炊若干次，膝下小儿皮包骨。
囫囵苞谷实难咽，怎奈停水复停电。
八爷爷，炮奶奶，请听市民诉苦来。
爷奶生病有派医，市民有病在家挨。
更怕土匪乘火劫，旗号还打爷或奶。

最后补充一组官方的数据作为本章收尾：“由于武斗不断升级，军管会被冲击，一些领导人和军代表被揪斗，已无力扭转混乱局面和经济恶化趋势。1967年和上年比较，工业生产全面下降。全省完成国民生产总值34.2亿元，比上年下降6%；工农业总产值45.8亿元，下降6.7%，其中：工业总产值21.6亿元，下降12.9%；钢7.2万吨，下降33.6%；原煤593万吨，下降17.3%；发电量15亿千瓦小时，下降6.6%；十种有色金属五万吨，下降24%。财政收入4.5亿

元，下降17%。”^[1]

目 录

启 之 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周孜仁印象（代序）

启 之 云南文革史稿 小引

导 言 9

卷一 阎红彦时代：从管涌到溃堤 13

第一章 文革前传 13

1.1. 循吏 13

1.2. “大跃进”中的德政 18

1.3. 告密与小说《刘志丹》冤案 27

1.4. “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省委文件 32

1.5. “于梁反党集团” 36

第二章 狂飙初起 43

2.1. 高治国与“四月提纲” 43

2.2. 照葫芦画瓢：“三家村”云南分店 50

2.3. 工作组：“反右”旧梦的破产 57

2.4. 以攻为守 71

2.5. “八二三”风暴 74

2.6. 力不从心的反扑 82

2.7. “破四旧”：转移斗争大方向 90

2.8. “三字兵”与“九一四”风云 95

第三章 溃堤 104

3.1. 走出“三家巷” 104

3.2. 造反个案及“大数据” 107

3.3. 阎红彦的困境 114

^[1] 当代云南大事纪要编委会：《当代云南大事纪要》1967年条目，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 3.4. 关于方向和路线的话题 119
 - 3.5. 走向深渊 123
 - 3.6. 硬汉赵健民 128
 - 3.7. 死事 131
 - 3.8. 余音：“一·一三”大裂变 137
- 卷二 军管时代：狂奔的仇恨与错位的篱笆 143**
- 第四章 大洗牌 143
- 4.1. 乱哄哄的开台锣鼓 143
 - 4.2. 用枪杆子扎紧篱笆 152
 - 4.3. 老干部的焦虑和迷惘 163
 - 4.4. 赵健民找“婆家” 175
- 第五章 从“四二六”到“五二八” 183
- 5.1. “四二六”事件：首次大武斗 183
 - 5.2. 力量重组·角色转换·舆论战 194
 - 5.3. “五二八”“五二九”：一个夸大的“惨案” 204
- 第六章 钦差大臣的昆明之行 220
- 6.1. 1967年的夏季形势 220
 - 6.2. 谢富治、王力到昆明 223
 - 6.3. “八八批示” 229
 - 6.4. “八四大会”和“摧资兵团” 235
 - 6.5. 力量的重组和转移 243
- 第七章 云南第一次大武斗 249
- 7.1. 关于云南武斗的概述 249
 - 7.2. 主力军 253
 - 7.3. 占山 258

- 7.4. “抢”枪那些事儿 266
- 7.5. 热战 277
- 7.6. 武斗时期的社会生活 282

- 第八章 政治“过山车” 286
 - 8.1. “八派”的嘉年华 286
 - 8.2. 迷乱的诸神 292
- 第九章 第二次武斗时期的血火高原 306
 - 9.1. 第二次武斗的基本特点 306
 - 9.2. 昆明拔钉子 310
 - 9.3. 农村包围城市和集体杀戮 324
- 第十章 走向“滑铁卢” 334
 - 10.1. 权力真空下的云南乱局 334
 - 10.2. 西征计划 337
 - 10.3. 官史记载和民间的现场记忆 341
 - 10.4. 末日 351
 - 10.5. 大神陨落 357
- 第十一章 又一回“过山车” 367
 - 11.1. 失控的云南乱局 367
 - 11.2. 虹山口学习班 371
 - 11.3. 吊诡的“四八指示” 378
 - 11.4. 关于“四八指示”的解析 386
- 第十二章 尘埃落定 390
 - 12.1. “平西王”谭甫仁 390
 - 12.2. 权力果实之树下的乱拳横飞 393
 - 12.3. 黄兆其的太极功夫 401
 - 12.4. 关于干部入阁 403
 - 12.5. 为何谭甫仁偏爱“八二三” 408
 - 12.6. “凯旋”在8月 411

【文艺研究】



中国电影：一个制度与观念的历史（下卷）

——文革电影（1966—1976）

CULTURAL REVOLUTION FILMS(1966-1976)

INSTITUTION AND IDEAS IN CHINESE FILMS(2)

启之 著

本书简介

文革是一个发端于五十年代的加速度运动，十七年电影的业绩之一就是为文革鼓劲加油。十七年电影的体制和运作，被文革去右取左，升级压缩，以极端的方式回放给了电影界。《纪要》既是激进文艺的纲领，又是它们的蓝图。《纪要》提出的三大主张，在文革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毛泽东与江青的分合，勾勒出文革电影的三个阶段：1966—1970年是混乱、停产，清理队伍的阶段；1971—1973年是树立样板，建设理论的阶段；1974—1976年是恢复生产、重组队伍的阶段。

本书除了总纲性质的《纪要》之外，分成两个部分。纵的部分讲历史——电

影人的境况、电影的大批判、电影的生产与审查，电影的禁映与放映。横的部分讲影片——样板戏电影、76部故事片和“阴谋电影”。

导 言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共统治大陆五十年中“最最有代表性的、最最本质的”时期，^[1]那么，文革故事片则是毛泽东时代“最最有代表性的、最最本质的”的文艺作品。文革故事片是调整政策的产物，也是宣传激进文艺思潮，巩固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文革前的十七年间，电影界的体制特点和重大举措，在文革中被去右取左，升级压缩，以极端的方式回放给了电影界。举几个例子：

1951年批《武训传》，1964年批“毒草电影”为极左开路，为文革热身，这一批判活动扩展到全国，持续了十几年。思想文化界被“犁庭扫穴”。

批判《武训传》之后，公私电影厂全部停产，一年半之中，没有一部剧本通过审查。1967年至1969年，除了新影之外，所有的电影厂全部停产，一停就是三年，而故事片直到1973年才恢复生产。

1957年“引蛇出洞”，大批电影人沦为右派。揭批、逼供、自杀、流放、劳改相随属。文革中，电影界批“三名三高”“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造成了更多的非正常死亡。“战高温”、下农村、上“五七干校”，成为流放与劳改的新常态。

1958年至1961年，文化部要求电影大跃进，各厂生产了大量“纪录性艺术片”，1962年调整，有一半影片禁映。1975年，各厂按文化部的要求，大干快上关于“走资派”的故事片。“四人帮”垮台后，几十部上马或待上马的电影成了“阴谋电影”，《盛大的节日》《千秋业》《占领颂》等影片禁映至今。

十七年中，出现过三次“非主流”电影，1974年至1976年间，出现了三部“非主流”影片，与以前的“非主流”一样，这些影片的主创者本来也是极力主流的，而在江青等激进派的眼里，他们成了异端。

十七年中，中共中央为了缓解社会矛盾，繁荣文艺，对文艺政策做过多次调

^[1] 这是《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的作者之一，Michael Schoenhals（沈迈克）对文革的认识。在与本书作者的通信中，他对书中的“Defining”一词做了这样的解释：“Defining here means something like the ten years that 最具有代表性的、最最本质的 illustrate what fifty years of CCP rule was about, what made it different from (for example) Soviet communist rule.”

整，文革中也有过政策调整。不同的是，主创者和管理者不是向主管部门反映意见，而是“告御状”。调整的方式，不是发文件，而是传达毛的批示。

1952年，成荫在拍《南征北战》时，遇到了“一条不成文法”：禁止表现我军内部的矛盾……我军的人物形象必须都是正面的，不可以有质量不良的，不可以有思想错误，甚至也不可以有落后现象。

1974年，遵照江青“不走样”的指示翻拍的《南征北战》，光大了“不成文法”：老片中破旧的军装，沾着泥土的脸和手，土房草屋中住着的老乡，战士们牢骚怪话和南腔北调被扫荡干净。新片中指战员穿戴干净整齐，无论战士、民工，说话全是标准发音，没有了怪话牢骚。老片中，是解放军在右，国军俘虏在左。重拍片是解放军在左，国军俘虏在右。

……

这些史实提醒我们，文革是一个发端于五十年代的加速度运动，在这个渐进的运动中，极左思潮由弱而强，变次为主。而十七年的电影界的主要业绩，则是在有意无意之中为这一运动鼓劲加油。

极左来自于左，其源头来自于1930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1985年12月23日，在“夏衍电影创作与理论研讨会”的闭幕式上，夏衍谈了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我们这些年轻人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文化围剿充满了愤怒，党在路线方针等方面‘左’，第三国际也‘左’，这些必然要反映到我们的具体工作中来。在左联成立之前的一九二八年，发生了一场文学论战，这场论战就是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开始的。当时郭老提出‘留声机论’，认为一切文艺都是宣传。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因为每个作家都有倾向性。但是，如果只是简单地把政治与文艺画等号，那就成问题了。从那时开始，左联及后来成立的剧联、电影小组、美术家协会都存在这个问题。”^[1]

结语：清扫旧影坛，建设新文化

赵丹临终前留下了这样一句话：“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他说的管，当然是党管。党用什么管？用政治管。政治统帅一切，文艺就成了政治帐下的

^[1] 夏衍：《我的一些经验教训》，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史研究史、中国电影出版社中国电影艺术编辑室合编《论夏衍》页441，1989年，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走卒；而电影则是诸走卒中最悲摧的一个。

文革后，说是要结束文艺的“一为”（为政治服务）。邓小平提出“两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人们欢欣鼓舞，以为这是文艺起死回生的良药。其实，在邓小平说这话的三十年前，在中共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上，就把“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确立为新中国文艺的总方向了。^[2]没有制度保证，邓小平的“两为”同样可以回到“一为”。

果然，邓小平“一为”的话音未落，“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指示来了。文艺重回“一为”的旧轨。一方面是《苦恋》《蓝风筝》《活着》《鬼子来了》等大批影片被禁，另一方面是以举国之力拍摄主旋律电影，重拾“歌颂与效忠”的老调。一方面“彻底否定文革”，另一方面拼命保住毛的地位和体制。本应彻底打扫的“奥吉亚斯牛圈”，在文革结束四十年之后，人们仍旧呼吸着臭烘烘的空气，浸渍在有毒的“红色经典”之中。

我们知道，电影有教育作用、认识作用、审美作用和娱乐作用。毛时代的政治误导了电影的认识，削弱了电影的娱乐，改变了电影的审美，歪曲且强化了电影的教化功能——党的思想观念和方针政策，成为观众唯一需要知道的东西。影片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它的历史命运，它的价值判断，完全系于执政党的方针政策之上。当这个党为走出毛的错误而自鸣得意的时候，实际上就等于承认，毛时代创造的“红色文艺”就是这些错误的文化晶体。而邓小平的“彻底否定文革”，无异于告诉人们，文革电影是毒害国人最烈的大众传媒。

现实主义的要义是真实客观地再现社会现实，政治的要义是忠实地为一党服务。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作为政治工具的电影，就会把忠实于现实生活，转变成忠实于党的要求；把对现实的真实描写，偷换成对现实的虚假掩饰。电影也就无可避免地与歪曲真实，掩盖真相结下不解之缘。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电影的这一转换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于是，在毛时代的电影史上，始终伴随着这样一个奇观：从周扬到“四大帅”，从影评家到影片主创，所有的人，都以客观再现生活为标准，大讲特讲现实主义的历史性要求，典型性原则，大力强调披露真实，戳穿伪饰的重要性。而银幕上呈现的，却是

^[2]这个会于1949年7月在北京召开。详见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页10，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相反的景象。

孟犁野在把十七年的电影与四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进行比较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一时期电影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不足，许多影片甚至背离了现实主义，沦为伪现实主义。”^[3]最明显的例子是农业集体化和革命历史与战争。

毛时代的最大错误，用邓小平的话讲，就是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4]上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人民公社，农业集体化在推行了三十年后，退出了历史舞台。曾几何时，农业集体化——从互助组、合作社（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被当成中国的“金光大道”。然而这条“金光大道”带给几亿农民的是什么呢？五十年后，中共党史承认：“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失。”^[5]

“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喊了多年，并没有给农村带来希望和转机。”^[6]“现行的人民公社体制是‘政社合一’实际上是‘党、政、社’三合一。这个体制弊端很多，权力过于集中，容易出现利用职权，按照长官意志管理和指挥生产。”“就全国来说，不宜提‘普及学大寨’的口号，建设大寨县的要求，实际是不容易办到的。”^[7]

1961年5月1日，刘少奇严厉批评《人民日报》：“你们《人民日报》上登的新闻，有多少是真的？你们天天用大字登头条新闻，今天说那里生产如何好，昨天说那里的公共食堂办得好，究竟有多少是真的？……你们报喜不报忧，只登好的，不登缺点、错误。”^[8]

刘少奇对《人民日报》的批评，完全可以用到电影上。从1950年拍的《农家乐》，到文革结束的1976年拍的《山花》《金光大道》《牛角石》《海上明珠》，27年来生产的90多部农业片，^[9]都是为宣传党的农业集体化——从互

^[3] 孟犁野，页500。

^[4] 邓小平的原话是：“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见《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1985年6月15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页116，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页503，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6] 同上，页1240。

^[7] 同上，页1249。

^[8] 肖冬连：《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下册，页737，北京，红旗出版社，1999。

^[9] 这个数字来自于对《中国影片大典》（1949.10—1976）的统计，十七年农业片约有80部，文革故事片中，农业片共12部。

助组、合作社（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服务的。所有的影片都是“报喜不报忧，只登好的，不登缺点、错误”。而且，所有的影片都把单干、发家致富、“三自一包”作为批评对象，不遗余力地抹黑那些主张照顾社员利益的干部，把这些人说成是搞资本主义的代表，说成是地富拉下水的腐败分子。

六十年代中期掀起的“农业学大寨”在把集体化推向高潮的同时，也把几亿农民推向了苦难的深渊——外出打工，为队里增加公共积累，为小家挣点零花钱，就是搞资本主义（《山花》）；到集市卖点山里采的山货，房前屋后种的土产，就是破坏集体经济（《青松岭》）；生产队搞副业，用自产的副食，跟工人老大哥换回短缺产品，提高生产效率则是破坏统购统销（《海上明珠》）。

通过近三十年的教育，人们牢牢记住了这样的“真理”：富裕就是倒退，有钱就是变修，一大二公就是好，人民公社是金桥，社会主义只能姓穷，越穷越革命。……1980年1月，安徽省召开农业工作会议讨论包产到户。“那些从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走过来的同志，很难转过弯来。”“最能表达否定者心音的是宿县地委负责人，他喉头呜咽，泪流满面，几乎抱头大哭——‘这哪像社会主义！毛主席他老人家辛辛苦苦几十年，我们呢？一步退到解放前！’”

[10]

使这些基层干部“很难转过弯来”的东西很多，毛时代的农业片是其一。

在毛时代的电影史上，革命历史与战争题材至少占了三个之最——数量最伙，“占了国产电影的近三分之一。”^[11]投资最多，因此社会影响，教育作用也最大。50后、60后回忆往事，如果提到当年的电影，大多会提到这类影片。

但是，“革命历史”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它指的是中共的光荣史、胜利史。非中共的历史事件和社会活动，无论其如何重大，都不在这个历史之内。最明显的是国民党抗日的历史。

抗战八年，中国军队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在正面战场上进行了29场大战役。国民党打了27场，200多位将军牺牲，数百万士兵捐躯。中共只打了一场半战役（平型关战役是与国民党联合作战、百团大战是中共独立作战）。毛时代的电影只讲中共抗日，对国民党的抗战，不但只字不提，反而竭力歪曲诋毁。把

[10]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决策》，郭德宏等编：《党和国家重大决策的历程》（下）页1252，北京，红旗出版社，1998。

[11] 章柏青：《历史意识·战争视野·艺术创新——评影片〈大转折〉》。载焯逸编：《银幕上的解放战争》页114，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

国民党前期的“先安内，后攘外”的错误政策，歪曲成他们的一贯方针；把国民党的正面战场的英勇牺牲，说成是“假抗日，真反共。”仿佛单靠《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就足以消灭数百万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日本侵略者。

三十年来，观众从二百多部革命历史与战争题材的影片中得到的是什么呢？是国民党对中共的屠杀，是红色苏区的开辟，是长征的艰苦，是延安窑洞里升起的太阳，是解放军对反动派的征讨，是毛泽东的神机妙算和中共的伟大光荣。至于国军抗日的浴血奋战，远征军的艰苦卓绝，国统区人民的牺牲奉献，中国名列世界五强，蒋介石成为举国瞻仰的民族英雄等历史真相，在毛时代的银幕上是绝对看不到的。直到毛离世十年后，广西厂推出“天鹅之歌”般的《血战台儿庄》，生长在红旗下的人们才恍然大悟——闹了半天，人家国民党也抗过日。

马德波说，十七年中的导演们都在进三步退一步地“扭秧歌”^[12]，文革时的导演们不扭了，能归队拍片就已经阿弥陀佛，焉敢不向样板戏看齐？

十七年电影就令人厌倦，文革片更上层楼；为了解读，要忍受无处不在的概念和公式，忍受无处不在的“直、露、多、粗、假”^[13]。但是，这种忍受，至少还有三方面的意义：

第一，有益于认识毛时代。激进文艺派自以为开辟了文艺新纪元，实际上，无论是样板戏还是故事片，都与十七年电影有着密切的关联，它们依靠着一个共同的思想体系，有着共同的结构和母题。解读文革故事片，既是对毛时代思想文化的剖析，也有益于认识“后毛时代”的“主旋律”。

第二，清理电影史。中共的“彻底否定文革”是以“利用论”为基础的，因而是彻底的。对于正本清源的学术研究，官方是禁止的。在这种语境下，中国当代电影史的研究者和讲授者对文革电影普遍采取了附和主流的态度。中国电影史的编写由此产生了一种“奇观”：尽管集体经济解体，控诉集体化罪恶的文学作品汗牛充栋；尽管史学界已经令人信服地指出了土改的不义，证明

^[12] 马德波、戴光昕：《导演创作论——论北影五大导演》页223，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

^[13] 夏衍在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上指出，当时中国电影有“直、露、粗、多”四弊。文革后的1979年1月，他在答《南方日报》的记者问时，说当时的电影除了这四弊外，还多了一弊：“假”，即“无论人物、情节、矛盾冲突、语言和细节描写都缺乏足够的生活依据，是主观随意性的产物。”见《南方日报》，1979年1月24日。

了集体化的害民，电影史的编撰者在谈论毛时代的农业片时，仍旧以赞美的语调描述那些歌颂集体化的影片。这种“奇观”，在其他题材的影片中同样存在。这种荒悖的现状也绝不仅为电影研究所独有，当代国史，从政治到文学，都分享着这种分裂与矛盾。因此，解读这些影片在还原历史真相的同时，有助于结束荒悖。

第三，建设新文化。破旧是为了立新。历史的“文化清理”，有助于清理思想，重新寻找立足点。梳理毛时代的中国电影，解读毛时代的影片，指出其中的毒素，是与现代文明接轨，建设普世性文化的第一步。

文革结束以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认识到反对封建主义的重要性，两者的分歧在于，官方并没有封建主义与“党文化”联系起来，其反封也只是做样子。民间的反封，首先反对的是与普世价值对立的“党文化”。百余年来，中国发动了多次启蒙运动，如果本书能为“新启蒙”贡献绵薄，能给予真实作对，向逻辑叫板的主流文化泼点冷水的话，就没有白写。📖

1999—2020

后记：我的“三要三不要”

这本书我断断续续写了二十多年。最早写的是“阴谋电影”和样板戏电影，本来我的计划是写文革电影史，自拟书名《文艺新纪元：中国电影》。“文艺新纪元”的说法来自张春桥：“江青亲自培育的革命样板戏，开创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纪元。”但是我发现，要想把文革搞清楚，必须先研究十七年。于是，我掉转头，从资料做起，在编了四卷本的《中国电影研究资料汇编》（只出了三卷）之后，动手写十七年电影史。书名定为《走向新纪元：中国电影》。我想通过书名传达我对文革的理解——历史是连续的，尽管江青把十七年的电影说成是“文艺黑线专政”的产物，但恰恰是这条黑线为她主政的文艺事业奠定了基础。

2010年，十七年电影史在台湾以《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电影》的书名问世，似乎很受欢迎，但是，我也听到了意见——没有影片分析。另外，有些地方也应该补充修改。我改了五章，加了四章，其中有三章是影片解读。现在，我把这两本书合成上下两卷，上卷十七年，下卷文革十年。

原来上卷四十四万字，下卷四十三万字，应出版方的要求，我进行了压缩精减。压减的主要是事例和引文。比如影片禁映的理由和要求，把那些文件上很具体的规定删掉。注释也做了精减，把那些为了丰富正文的例子拿掉了。其实这是很可惜的，这些文字不仅会使全书饱满丰盈，而且对也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线索。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常想起明末的三大儒——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从这些先贤又想到五七年的右派，想到这本书里写到的电影人。

明亡之后，顾亭林考学问难，笔耕不辍，坚辞清廷明史馆的高位。王夫之藏身瑶洞，潜心著述垂四十年。黄宗羲隐居故里，讲学立说，屡拒清廷的征召。此三人分明知道，自己的呕心沥血之作在活着的时候绝无问世之可能。他们为什么要甘居草野，而不去“曲线救国”——先当上官，取得话语权，再徐图发展呢？为什么写那些无法付梓的文字——学问总会有人作，留给后人又有何不可？他们图什么呢？

私心以为，顾、王、黄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有历史感，有使命感，有对学术的忠诚，有对言说的自信。他们知道，世道会变，实事求是之说，经世致用之学在时间的汰洗下，迟早会现出光辉。他们知道，屁股决定脑袋，当上了清朝的官，就会像徐乾学一样，成为御用文人，其话语权就只能用在为当局歌功颂德的《大清一统志》上。“徐图发展”云云不过是求取荣达富贵的遮羞布。他们知道，值此“天崩地解”之时，一介书生，只能以无用之身行有用之事。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使命鞭策着他们，使他们坚信求真的思想是民族的灵魂，求实的学问足以明道淑世。真理需要探索，学问有待积累。把这些事情留给后人是他们这代人的失职，是吴伟业、侯方域、陈名夏一类士人依附主流的借口。正是这种对历史的认知，对使命承担，使他们拒绝了“俊杰”的诱惑，变成了不识时务的异端。正是这种忠诚和自信，使他们选择了凶险艰难的人生，走上了远避主流，不求荣达的道路。

二百多年后，坚守得到了回报——他们以傲人的铁骨、终生的困顿、二百年的寂寞为中国的思想学术建立了丰碑，我们有了《日知录》，有了《船山遗书》，有了《明儒学案》。

想起这三位先贤，是因为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也分明知道它无法在大陆问世。叩问他们之所图，也是在反问自己。我无法与这些先贤相比——顾、王、黄是有多方建树的鸿儒，我是一无所成的书生；他们有亡国之痛、离乱之悲，我生在红旗下活在小康中。他们有绍续文化传统之心，而在我看来，这个以极权主义为核心的文化传统必须抛弃。亭林讲的是亡国、亡天下，船山讲的是气、理，梨洲讲的是君、臣。我讲的是毛时代的电影。他们之所图，是实事求是，经世致用；是“发抒志意，昭示来兹”。我之所图是总结经验教训，挖出文化之病根，以促进思想、制度之变革。如果说我与他们还有一点相通的话，那就是说真话。

说真话是实事求是的前提，但是有了这个前提并不等于实事求是。在五十年代初的第一次文艺整风中，电影人真诚地检讨自己的小资思想，诚恳地否定过去的创作。他们说的是真话，可这真话反映的却是假的事实。五七年反右以后，电影人学会了说假话。文革期间，饱尝苦难的电影人唯求重返影坛，全不在乎“三突出”“高大全”。可以说，毛时代的电影人在这近三十年中经历了两个时代——无意“造假”的时代与有意“造假”的时代。

“个体是历史的人质”。倘若我生活在毛时代，会和当年的电影人一样，在假话中虚度人生，将心血奉献给空想的政治。当我有幸生活在“中国梦”中，为了出书、为了名利而去“造假”，那我就辜负了新时代。上负先贤，下愧后人。

“要研究真问题，不要研究假问题；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要笃学力行，不要投机取巧。”每次给新生上课，我都要在黑板上写上这“三要三不要”。

美国华忆出版社帮助我完成了说真话的夙愿。与右派们相比，我是幸运的——说了真话而不至家破人亡；与先贤相比，我也是幸运的——在活着的时候，看到这本书的出版。📖

作者谨识
2020-1-16

【本书节选】

第十章 文革故事片概说

如果不算样板戏电影和“阴谋电影”，文革中一共生产了76部故事片。^[14]就数量而言，文革时期远少于人民电影时期——十七年生产了518部故事片，年均30.47部，而文革年均仅7.6部。^[15]但就题材而言，后十年则要比前十七年丰富得多。它不但有革命历史/战争、工农业、儿童等传统题材，还有教育革命、赤脚医生、知识青年、工宣队、以及“写走资派”的所谓“阴谋电影”等原来没有的题材。歌颂文革的任务，主要由这些新题材承担。^[16]

有几个数字，值得一提。在这76部故事片中，描写十七年的题材，除了根据小说改编的影片（如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之外，大部分影片都以五六十年代为背景。^[17]这是为什么？

答案很简单，这是电影为政治服务的结果——按照文革的解释，这一时期正是毛的路线与刘的路线激烈斗争的时期，为了反击刘的路线，毛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反修防修”“自力更生”“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等方针政策，把这段时间发生的故事搬上银幕更能突显斗争的激烈和毛的伟大英明，也会更有戏剧性。

另一组数字：1974年生产了17部电影，其中故事片9部（包括3部重拍片），

^[14] 这个数字包括那些未刊发的影片。见王功璐主编，《中国影片大典：1949.10—1976》，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

^[15] 这一数字来自对《中国影片大典：1949.10—1976》所载片目的统计。

^[16] 保罗·克拉克（Paul Clark）以“主题”来划分文革故事片。认为其“主题无非两种：中国革命的战斗故事和乡村的当代故事。城市主题的故事片几乎不存在。”他所说的主题，其实就是题材。他忽略了工业题材的存在，也没有看到教育革命、赤脚医生、知识青年、工宣队等文革中涌现的新题材。见《中国文化大革命：一种历史》（*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History*）页135，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17] 在文革故事片中，工业片共有7部，其中有5部写的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苏联专家撤走之后，中国工人阶级自力更生的故事。这5部是：《创业》（长影，1974），《钢铁巨人》（长影，1974），《火红的年代》（上影，1974），《第二个春天》（上影，1975），《开山的人》（西影，1976）。写文革时期的只有2部：《战船台》（上影，1975）和《青春似火》（北影，1976）。农业片有12部，其中有6部写的是五十年末，六十年代初的故事：《山花》（北影，1976），《牛角石》（北影，1976），《青松岭》（长影，1973），《战洪图》（长影，1973），《沙漠里的春天》（长影，1975），《锁龙湖》（长影，1976）。只有《艳阳天》（长影，1968）写的是1956年秋的事，《金光大道》（长影，上集1975，中集1976），写的是五十年代初成立互助组的故事。农业片中有4部以文革为背景：《山里红梅》（珠影，1976），《欢腾的小凉河》（上影，1976），《海上明珠》（北影，1976），《新风歌》（上影，1976）。文革故事片中，儿童片共12部，《闪闪的红星》《黄河少年》《烽火少年》《金锁》4部写的是革命战争中的儿童，《草原儿女》《向阳院的故事》《小螺号》3部写的是1958年至1965年的故事。以文革为背景的有5部：《小将》《阿勇》《阿夏河的秘密》《红雨》《渡口》。工农业和儿童题材共计31部，以文革为背景11部，占总数的七分之一。以五六十年代为背景的20部，接近总数的四分之一。

现代戏曲片8部。1975年生产了25部电影，其中故事片19部，歌舞片三部，现代戏曲片3部。1976年生产了95部电影，其中故事片28部，8部现代戏曲片，一部歌舞片，58部古代戏曲片。其数量相当于故事片的两倍还多。为什么前两年古代戏曲片一部都没有，而到了1976年却冒出了这么多的古代戏曲片呢？

这还是电影为政治服务的结果——为了应对毛泽东1975年的批评，于会泳主政的文化部以增加古代戏曲片来装点繁荣。人民电影时期，陈荒煤批评各电影厂一完不成任务，就拿戏曲片来凑数。这话同样可以用于1976年。

对于以“破四旧”开场的“文艺新纪元”来说，这是一个大讽刺。《琴挑》《思凡》《游龙戏凤》显然是对禁欲主义的反拨。《空城计》《李陵碑》中的忠孝节义无疑在暗示着“四旧”的归来。坚持文草原教旨的激进派，大概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这58部戏曲片竟有三分之二（37部）“未发行”。

文革从文化批判始，以文化“创新”（新生事物）终。就思想内容来讲，其“创新”就是把人民电影时期的六大母题做一番改造（见上卷第二章）。文革故事片的结构、叙事和人物塑造对此做了充分的展示。

就认识社会，感知历史而言，这些影片具有难以匹敌的价值。它们是罕见的政治化石，是极左思潮的实物展览，是意识形态的百科全书。“后毛时代”无法想象的视听元素：匪夷所思的人物，荒谬绝伦的思想，乖情悖理的言论，蛊惑人心的激情和为情理所不堪的故事，都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创业》《海霞》《闪闪的红星》《金光大道》等少数影片之所以得到了人们的称赞，除了艺术的原因之外，还因为其中有较多的普世性。

第一节 结构：三个板块

文革故事片继承了样板戏的结构，也是由三个板块组成，第一个板块是以阶级斗争为主的“革命至上”；第二个板块是以忆苦思甜为主的“新旧对比”，第三个板块是以歌德效忠为主的“颂圣输诚”。这三个板块大小不同、形状各异。阶级斗争是一条红线贯穿始终。这条线决定着故事的走向和内容。忆苦思甜是镶嵌在叙事上的块状物，它的作用是交代背景和促使情节的转变。颂圣输诚是叙事中的“结石”，它散布在影片的“五脏六腑”之中，其效果是降低趣

味性，提升“政治正确”的指数。

功能的不同，这三个板块在影片中的地位也不同。第一个板块负责围绕着阶级斗争来编织剧情，设计人物。不同的题材有不同的斗争，农村题材将故事锁定在“学大寨”上面，工业题材围绕着“学大庆”和自力更生，知青题材以是否“扎根农村”为主线，儿童题材以挖出阶级敌人为主旨。总之，阶级斗争是一副七巧板，不同的题材，会拼出不同的样式。如工业题材：

1. 国家急需某种产品或技术，外国（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国家）卡中国的脖子，工人要自主研制。厂长/主任/技术人员保守崇洋，双方发生矛盾。

2. 由于更高的领导的支持。工人得以自主研制，但阶级敌人破坏，研制受挫，保守或崇洋者得逞。

3. 工人克服困难，抓住了敌人，教育了保守、崇洋者，自力更生的路线取得了胜利。

与五十年代的同类题材《在前进的道路上》《伟大的起点》《无穷的潜力》等影片比较，文革时期的拼装除了将旧公式翻新之外，还与时俱进——将五十年代的先进与落后之争，提升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

关于农业题材，七巧板会以如下模式对待之：

1. 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代表（副业队长、地富反坏分子）得到只抓经济不抓政治的上级（队长、公社副主任）的支持，发展“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带社员外出打工、支持社员为自家挣小钱）。受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代表（党支部书记、积极分子）的阻止。

2. 毛路线的代表主张学大寨（开荒、筑坝、打井等），得到了群众的拥护。他们带领社员大干。刘少奇路线的代表竭力反对，并阴谋破坏。

3. 毛路线的代表识破敌人的阴谋，克服困难，取得学大寨的胜利。

农业题材在五十年代宣传农业合作化，《葡萄熟了的时候》《春风吹过诺敏河》《不能走那条路》《人往高处走》等大批影片成了公式的搬演，概念的注解。六十年代宣传人民公社，《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李双双》等影片，打破了公式概念破土而出。至文革前夕，“黑五类”破坏集体经济成了主流，《夺印》《槐树庄》《山村会计》《山村姐妹》等反映阶级斗争的影片纷纷出笼，公式化概念化卷土重来。及至文革，原来的公式概念进一步完善，发展成

为“地富反坏右”与党内“走资派”携手破坏学大寨，阶级斗争也由此提升到了路线的高度。

这个高度使影片不约而同地建构起一种“阻拦模式”——《青松岭》中，老贫农张万有拦住钱广，不准他给社员带山货到集市去卖。《艳阳天》里，萧长春在村口拦住出去打工的社员。《海上明珠》中的凌燕子拦住外出打鱼的船，禁止社员“赶小海”。《沙漠里的春天》中，娜仁花揭穿了队长达木林的阴谋，拦住外出打猎和逃荒的牧民。《山花》中，高山花拦住副队长和那些会木匠手艺的社员，打破了他们“每人每天给队里交一元五角，剩下的归自己”的外出挣钱的美梦……。

公式化概念化也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它以扭曲的形式提醒人们，既然如此众多的影片，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这一情节，那么，这是否说明自发势力有合理性？既然那么多社员们都想去打工，那么，它是否顺乎人心？而那些党代表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

忆苦思甜是以国共两党和新旧社会做比较的。因此，在十七年的电影中，它在时空上有严格的规定：忆苦——解放前，思甜——解放后。文革故事片打破了这一规定——主人公所忆之苦，从解放前延伸到了解放后，从旧社会发展到了新社会。这是什么苦呢？是广大贫下中农长期缺医少药之苦（《雁鸣湖畔》），是被城里人视为贱民之苦（《春苗》），是被剥夺了受教育机会之苦（《决裂》），是儿女被修正主义毒害的忘本之苦（《芒果之歌》）……

为什么会有这些苦呢？影片告诉人们，这是刘邓路线统治的结果。这个路线使卫生部成了“城市老爷部”，罔顾劳动人民的疾苦（《雁鸣湖畔》）。这个路线使城里人看不起贫下中农，说他们“拿锄头的手拿不了针头”（《春苗》），这个路线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持了大学（《决裂》），使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泛滥成灾，腐蚀了工农子弟（《芒果之歌》）……。这个路线与国民党一路货色，在旧社会，田春苗的父亲因为看不起病而死，在新社会，阿芳嫂的女儿小妹因为卫生院的耽误而亡。旧社会，不允许女工生养孩子，新社会将好好的孩子教育成不认爹娘的孽障……。这些电影告诉人们，毛对文革的定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

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无比正确的。因此它要让人们认同这样一个“真理”：“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使人民吃了二遍苦受了二茬罪。”

忆苦是为了思甜。思，就是对比，对比于影片中的甜，即故事提供给人们的现实生活。这个生活分两种，一种是已经存在的东西，如当下的幸福日子。另一种是可以得到的东西。即文革提供的机会。前一种思甜在十七年电影中经常使用，它以国民党、蒋介石、旧社会为参照，歌颂共产党的功业，领袖的伟大和新社会的好处。后一种思甜以刘邓黑线，资产阶级专政，修正主义制度为参照，歌颂的是毛的革命路线、无产阶级专政和文化大革命。这后一种思甜是文革故事片对中国电影史的独特贡献，它记载了一段空前绝后的历史，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它还提供了一种有趣的对比——文革后的某些电影，十七年和文革成了忆苦对象，新时期成了思甜的根据。这样一来，毛泽东时代与蒋介石时代，新社会与旧社会成了等价物，在无意之中，被置于历史天平的两端。

在三个板块中，颂圣输诚对显示影片的“政治正确”最直接也最有力，同时，它对影片的艺术性也伤害得最严重。阶级斗争虽然照章宣科，但还有辗转腾挪的空间，如果选题取巧，会减少公式概念的痕迹。《江水滔滔》《沸腾的群山》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忆苦思甜虽然是八股文章，但如果有生活细节做支撑，还不至于太让人讨厌。颂圣输诚的空间逼仄狭隘，要么在主席像前抒情，要么在东方红乐曲中挺胸，要么读毛著而醍醐灌顶。再高明的编导也只能自叹技穷。

从以“毛主席万岁”结尾的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到领袖崇拜在银幕上形成“结石”。电影中的颂圣输诚与现实密切相关，一方面，电影与生活同步，艺术真实地反映生活；另一方面，生活也被艺术影响。样板戏通过电影而普及，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通过银幕而推广，艺术与生活互动，崇拜与迷狂齐飞。

说到底，三大板块就是三个公式、三种概念。公式化概念化是新中国电影的顽疾，早在五十年代，电影局负责人蔡楚生就对此痛心疾首：“许多人这样说：我们这些作品，看了前面就知道后面是什么，人物一出场，马上就猜到下

面的发展，所以不看也可以知道。这是善意的忠告，也是尖锐的讽刺。”^[18]

无论是忠告还是讽刺，这种声音到六十年代中期完全消失。六十年代后期，在样板戏成为一切艺术的榜样之后，公式化概念化成了文艺创作的必由之路，病态变成了常态，昔日的溃烂之处，此时已艳若桃花。这说明了文化生态的恶劣，也说明人们思想观念和审美意识的蜕变。公式化概念化与受众之间也是互文性的，经过革命的长期浸染，它们已经被内化为观众自身的欣赏习惯和审美需求。换句话说，离开了上述板块，人们已经不知道如何创作。这就是为什么在文革结束后的很长时间内，“帮风”“帮气”仍在很多文艺作品中盘踞不去的原因。

第二节 叙事：三种模式

在上面说的三大板块之中，阶级斗争是最大最重的一块。所有的现实题材都要围绕这种斗争讲故事。这是自重提阶级斗争后，文艺创作形成的一个牢不可破的规范，在这种规范的指导下，敌我力量的配置和彼此斗争的方式就构成了影片的主要叙事，并由此发展出两种叙事模式：一种是阶级敌人利用资产阶级思想来腐蚀青少年，如《千万不要忘记》《山村姐妹》《霓虹灯下的哨兵》；一种是阶级敌人利用落后的领导搞破坏，如《槐树庄》《箭杆河边》《夺印》。

文革故事片中的现实题材继承了后一种模式，这里的阶级敌人因题材而变化，在农村片中，主要由地主、富农来承担。在工业片中，主要由搞技术人员或管理干部中来承担。这里的领导，在农村片中，多数是队长、副业队长、党支部副书记。在工业片中，多数是厂长、党委副书记。不管农村还是工业，这种领导多是抓业务的，且不是第一把手。说他们落后，指的是他们只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思想麻痹，成了他们的保护伞。《青松岭》《阿勇》《龙江颂》《山村新人》《红雨》等就是按这种模式写的。如果我们用“白”来指代那些落后的领导，那么，这个模式就可以简化为“黑 + 白”。

如果要细分的话，这里的阶级敌人，还有内外之别，外，指的是社会上的“黑五类”，内指的是那些隐瞒了出身成分，伪造历史，窃取了会计、大队委员、副队长、副书记、副总指挥一类的职务的异己分子。内外勾结，利用落后

^[18] 蔡楚生：《对1954年电影创作工作的补充发言》，载《业务通报》（九），1955年6月，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办公室编印。

的干部，干坏事，《艳阳天》《创业》《沙漠里的春天》等影片都是按这个模式写的。

文革发展了后一种模式，把落后的领导换成了“走资派”，成了阶级敌人与“走资派”勾结搞破坏。这一模式的创新之处是“走资派”的出现。^[19]在传统的叙事中，这种党内的领导只有在出身有问题，或历史上有污点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与“地富反坏右”搞在一起。“走资派”的加盟打破了这个教条。《金光大道》中的村长张金发与富农冯少怀、奸商沈义仁、逃亡地主范克明，沆瀣一气，大搞投机倒把。《春苗》中的公社卫生院书记院长杜文杰与地主之子，医疗组组长钱怀仁穿一条裤子，卫生院成了“城市老爷院”。《欢腾的小凉河》中的大队副业会计白汉成与富裕中农阮富刚结成一伙，搞地下包工，破坏鱼塘。如果按照文革后的说法，“走资派”是对老干部的污蔑，那么，这个模式可以简化为“黑 + 红”。

在实际创作中，人们有时会以更繁复的方式将上述元素进行组合。最常见的是，将内外的阶级敌人与“走资派”与落后的领导放在一起，让他们共同搞破坏。比如《雁鸣湖畔》中，外面的阶级敌人是老地主巩世鳌，内部的是暗藏的国民党特务林大全，“走资派”是县委副书记陈途，落后的干部是环水大队的队长宋长有。巩世鳌与林大全相勾结，破坏合作医疗。宋长有只抓生产，麻痹大意，把林大全看成是有经验的医生，为他出入医疗站保驾护航。以“超越历史阶段”为借口，砍掉环水大队的合作医疗的县委副书记陈途，则在路线上与阶级敌人不谋而合。不妨说，这是一个“黑 + 白 + 红”的模式。

第一种叙事“黑 + 白”模式。敌人是传统的专政对象——“地富反坏右”。他们在领导班子之外，无法利用权力进行破坏。其最大的作为也无非是煽阴风，点鬼火，造谣惑众，散布些反动思想。这种模式文革前就出现了，《槐树庄》《箭杆河边》是这种模式的开创者。

第二种叙事“黑 + 红”模式。是毛泽东反修防修的产物。在毛为首的中共中央看来，苏联变修是因为搞“全民国家、全民党”，放弃了阶级斗争，导致了集体农庄和工厂的领导层大面积的蜕化变质。^[20]毛发现，在中共党内存在着

^[19] 尽管“走资派”这一概念含糊不清，但是在有关的影片中，他们的基本特征倒是清楚的：一是抹煞阶级斗争，二是腐败蜕化，三是不为人民服务。

^[20] 详见《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红旗》社论，1964年7月14日。

一个与苏联相呼应的思想路线。他们在农村政策上鼓吹“三自一包”，在对外政策上宣扬“三和一少”。在毛看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路线的搏斗已经摆开了战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向他扑过来，要夺他的权，改他的路，红色江山岌岌可危。当《五一六通知》把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定为运动的重点，当国家主席成为“走资派”的最高代表而被万炮齐轰，当农村的生产队长、工厂的小组长，学校的教研室主任也成了“走资派”，当中共的意识形态主管指示“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作品”的时候，艺术家所能做的，就是以十倍的热情，百倍的努力，集体地“拥抱”这种以前不准写的崭新的人物形象。

第三种模式“黑 + 白 + 红”文革前就已初露端倪，1963年出品的《夺印》就是向这种叙事模式的过渡。影片中的三个反面人物，一个是解放前借汉奸的势力，在城里开过行，放过债，土改时，却被划为贫农，并混入了大队领导班子的陈景宜；一个是解放前参加过三青团，解放后隐瞒历史，当上了大队会计的陈广西；还有一个是丧失阶级立场，与二陈打得火热的大队长陈广清。^[21] 文革中，这种模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山花》中的漏网资本家孙光宗与黄土坡的大队长郭顺风构成了“黑”，白石滩的大队长胡根茂、副业队长马其家构成了“白”，赵子岳饰演的公社刘主任代表了“红”。

从“黑 + 白”，到“黑 + 红”，再到“黑 + 白 + 红”，这是一个呈递进状态的，由浅而深的变化。文艺界对文革意识形态的这一响应与迎合，反映了自六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日益加重的危机感。

第三节 人物：新人形象

在“三突出”的指导下，文革故事片在人物塑造上做出了重大贡献。它塑造了一批包括红卫兵、知识青年、赤脚医生、工宣队员，以及反林彪路线的“五好战士”在内的新人。通过这些人物，影片对毛泽东时代做了新的阐释。如果说，样板戏为重建 1949 年前的历史尽了心，那么文革故事片则为重写 1949 年

^[21] 电影《夺印》是由同名评剧改编的。此剧是根据 50 多年前《人民日报》刊载的一篇通讯《老贺到了小耿家》改编的。剧中的反面人物的原型，高邮人耿景宜因此牵连入狱。上世纪 80 年代初，经复查《老贺到了小耿家》报道失实，耿景宜被平反。2013 年，耿的后人以《夺印》侵害名誉权，将继续上演这部剧的中国评剧院告上法庭。2015 年，扬州市中级法院终审裁定，中国评剧院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原告 2 万元。日前，中国评剧院履行了该判决。《扬子晚报网》，2015-06-25，<http://www.yangtse.com/shehui/2015-06-25/557737.html>（2015 年 11 月 18 日查）。

之后的历史尽了力。

某些西方左派学者认为，毛发动文革是为了打破官僚主义机器对人民主体性的压迫。文革中推行的大公无私、消灭社会差别，打破社会分工，限制商品经济发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以消除物化等措施，是为了使人得到全面发展。使文化“自我转化”。自我转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试图为新社会塑造社会主义新人”而“塑造新人的目的，是要对付新政权本身颀颀的官僚主义。”这种新人必须大公无私，成为亦工亦农亦文亦武，时时批判资产阶级的“全能的人”。^[22]文革故事片似乎证实了这种说法，不过，影片中新人有着“全能的人”所没有的特点。

首先，在阶级斗争学说的培养下，这些新人都特别“好斗”。用毛时代的说法，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用邓时代的说法，则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斗争对象主要是人，首先是新人的顶头上司。

在这方面，《海上明珠》中的新媳妇凌燕子最为突出。她的斗争对象郭老大，既是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又是她的公公。这种人物关系设计提升了她“好斗”的难度，也由此塑造出一个从文革风暴中冲杀出来的红卫兵女将的高大形象。影片一开始，是凤凰岛的男女老少在新房前眼巴巴地等着新娘子凌燕子的光临，而这位渔业学大寨的女杰在上门的路上，就发现了敌情——凤凰岛生产大队的副业队长崔民在集市上倒卖尼龙丝网。是可忍，孰不可忍？！凌燕子当众抓住崔民，狠批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崔民夺路而逃，凌燕子冲上前去，一把扯破了他的衣袖。从此，登上了凤凰岛的凌燕子摆开战场，向公公、向领导、向人心、向情理挑战：郭老大请崔民搞运输，凌燕子当场否决；郭老大反对在深海急流处种海带，凌燕子率领妇女顶风而上；郭老大批准给合作单位几筐鲜鱼，感谢人家买给大队的柴油机。凌燕子拦住送鱼的船，坚决堵住“资本主义道路”。郭老大没法，决定把那几筐鲜鱼分给社员，凌燕子振臂高喊：鱼是国家统购统销的商品，必须卖给城里的水产公司！社员们背小篓子“赶小海”，捞点小鱼小虾，企图到集市上换上几块钱，凌燕子挑灯夜战，召开大会，用列宁语录大批特批。逼得崔民见风使舵，郭大老忍气吞声。……

这种“好斗”性格，在文革前的人物身上也不遑多让。白石滩大队的高山

^[22] (美) 德利克：《世界资本主义视野下的两个文化革命》，刘青峰主编，页 465、466。

花就是一个。山花是这个大队的书记，大队长老根茂是她的救命恩人又是她的养父。白石滩亩产跨黄河得了锦旗，公社刘主任指示老根茂利用冬闲搞搞副业，提高分红，让大家置办些新衣新被。老根茂派副业队长马起家带社员出去打工，没想到，刚从大寨回来的山花“一脚踢翻了一桌席”，顶住了刘主任的“资本主义道路”。为了学大寨，她说服老根茂，带领社员围滩造田。眼看丰收在望，洪水来了，白石滩遭了大灾。正在犯愁之际，刘主任给他们送来了救济粮和救灾款。可山花不但不收，还把刘主任大批了一通。刘主任苦口婆心，给她做工作，她与刘拍桌子瞪眼，逼得刘主任停了她的职。老根茂劝她听主任的话，她正色回答：“我与你走的不是一道路。”……

这种斗争精神，虽为情理所不堪，却为政治所钟爱：方华先是跟队长张振和对着干，后来又把矛头指向了公社的赵副主任；梁东霞从反技术科主任余从吾开始，一直反到了厂长头上；而那位健硕壮美的蒙古姑娘娜仁花，则毫不犹豫地把当年救过她性命的恩人，现任旗委副书记的塔拉当作了头号斗争对象（《沙漠的春天》）。毫无悬念地，在这些影片中，将胜利与光荣永远属于这些被为“闯将”“红辣椒”“冲吹锋号的”“反潮流”的新人们。她们反对的那些人，则无一例外地成了“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鼓吹者、“资反路线”的执行人。

跟落后保守的领导进行斗争的人物，在文革前的作品中也有。比如《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的李克明、冯巧英、高占武、孔淑贞等人。他们要搞水力发电站，老社长不同意。但是这些年轻人得到了公社赵书记的支持，他们刻苦钻研技术，经住了失败的考验，终于把水电站建成了。老社长受到教育。这种人物所反对的，只是领导的保守思想。他们是在人民内部矛盾中思考问题，而不知“路线”为何物。

斗争需要对象，新人练就了从生活的细枝末节中发现阶级斗争的“特异功能”。《山村新人》（长影，1976）中的方华是知青户的户长，她们插队的地方是长白山脚下的靠山屯。靠山屯没有电，为了发电，队里修起了水电站，水电站站长、村里的能人王德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城里买来了一台发电机。正当男女老少为这台来之不易的机器兴奋不已的时候，方华却慧眼独具，从中发现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王德山是靠人情关系弄来的这台机器。为了配合

当时正在开展的批修整风，她给王德山贴了一张大字报——《不许用资产阶级的人情世故腐蚀青年》。她的这一发现，惹怒了生产队长，得罪了公社领导，还差点出了人命，但是却挖出来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阶级敌人——影片用一个拙劣的“八股”告诉人们：王德山是个伪造历史，暗藏了多年的国民党特务。当然，编导还不失时机地指出，方华的这一惊人发现，还极大地教育了队长张振和，使他为自己所犯的路线错误痛悔不已。

与方华的本领比起来，其他新人的“特异功能”也不遑多让：女电工梁东霞从轧机自动化的设计图纸中发现了“洋奴哲学”（《青春似火》），装甲部队的团政委从醋化饲料中发现了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长城新曲》），红小兵阿勇从鸭群里发现了地主分子的捣乱破坏（《阿勇》）……如果我们把目光扩大到小说、戏剧等领域，就会发现，这是文革文艺塑造正面人物的一个常用手法。

文革前的文艺，即使是六十年代初大讲阶级斗争的作品，在这方面也没法与文革相比。尽管那时的作品中也有些阶级觉悟高、政治嗅觉强的人物。但是，他们上纲上线的本领，与新人一比，就成了“小小巫”——老工人丁海宽所发现的，不过是儿子丁少纯的贪图享受（《千万不要忘记》），指导员路华所发现的不过是陈喜的忘本（《霓虹灯下的哨兵》），萧继业发现的，不过是一个逃避艰苦生活的同学（《年轻的一代》）。他们的所能做的，只不过是个人主义上纲到资产阶级思想，而没有具备将阶级斗争发展成路线斗争的“特异功能”。

斗争需要勇气，嗅觉需要能力。这些新人的勇气和能力从何而来呢？

它们来自新人的第二个特点——英雄情结和道德主义。方华对王德山的不依不饶，是为了扫荡资产阶级人性，纯洁社会道德。梁东霞强占设计室，勇夺自动化设计的大权，是为了打破修正主义的条条框框，让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赵四海拼死也要炼出“争气钢”，也是为国争光。凌燕子不准副业队长跑运输，不准社员“赶小海”，是为了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保卫社会主义中国永不变色。而凤凰岛、白石滩的社员们欣然影从，弃小我为大家，先集体后个人……。会为这些高尚品德、高远理想大大感动的观众们，在无意之中，也把影片中的“高调道德专政”和“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的斗争绝对化思维接

受下来。^[23]

在某些西方左派看来，这些新人验证了他们关于文革的理论。你看，凤凰岛、白石滩的社员们正在抵抗物化的金光大道上迅跑。大公无私的人生哲学已经深入到了田间炕头。你看，梁东霞、赵四海以其主体性战胜了官僚主义。这不正是“草根阶层通过民主方式参与社会生活”“管理生产活动”^[24]吗？这一切不是都在证明文革“是文化上的自我转化”吗？

这是天大的误读。凤凰岛的男人们“赶小海”，是为了给老婆扯件的确良的衬衫；白石滩的社员们外出打工，是为了给家里添新衣新被；青松岭上的社员们托车信到集市上卖土产，只是弄点零花钱……。 “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种正当且正常的物质需求不会使人物化，只能使人文明。凌燕子、高山花禁止社员们改善生活的“穷过渡”，只能加剧物质匮乏，匮乏带来的是野蛮，是人性的堕落，匮乏到一定程度，则会“人相食”。

梁东霞、赵四海确实发挥了“主体性”，有效地抵制了“现代官僚主义”——那位被文革整得八面玲珑的设计室余主任，那位支持余主任的革委会领导，还有那位顽固保守的白厂长。但是，与奉旨造反的红卫兵、造反派一样，梁、赵并没有反潮流，而是迎合潮流（真正反潮流，保持着主体性的，恰恰是那些压制新人的人）他们并没有反官僚主义，而是迎合了更大的官僚，正是因为有这些大官的支持——梁东霞后面有冶金局党委书记，赵四海后面有厂党委王书记。他们才稳操胜券。这些书记们之所以具有权威性，不仅因为他代表党，更重要的，是他站在毛的路线一边。进言之，是毛赋予了梁东霞、赵四海的主体性，是毛给予了工厂的民主方式，同样也是毛让他们反官僚，没有毛，一切免谈。

至此，可以回答上面的为什么：新人们之所以有强烈的英雄情结和道德主义，是因为他们信奉一种宗教。

这是新人的第三个特点。新人是毛的信徒，毛是他们的教主，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新人的教义，文革是新人的救世良方，“封资修”是教义中的魔鬼，而集体主义、大公无私、反修防修、忠君爱党则是新人的“诫律”。人们说文

^[23] “高调道德专政”是钱理群在《从清华大学红卫兵运动看文革时期的群众政治》一文中提出来的，见《记忆》170期。

^[24] （美）德利克：《世界资本主义视野下的两个文化革命》，刘青峰主编，页468。

革电影富有“激情美”，殊不知，正是这种宗教情怀哺育了这种激情。

可以把梁东霞、赵四海等人物，看作是坚持自力更生的英雄，开顶风船的角色，有主体性的好汉。但是，似乎也不忽略他们的另一面。在《青春似火》中，有这样一场戏：假日，梁东霞和工友——当年的红卫兵去郊游，头上是蓝天白云，脚下是河水淙淙，四周是青山绿树，优美的风景引发了她们的诗兴：

我们的线路很长很长，
从巴黎公社接到天安门广场，
还要绕遍全球，放射共产主义的光芒。
我们把计算机按得“格格”直响，
算一算帝修反的寿命还有多长。

这是真诚的，也是虚假的；真诚的是情感，虚假的是内容。这种狂热的宗教艺术，远有大跃进民歌，近有红卫兵战歌。信奉“革命至上”，怀抱英雄情结，高举道德主义，誓死捍卫党/毛，把为共产主义理想牺牲视作最大光荣。是什么养育了这种新人精神呢？就电影来说，《雷锋》出力最多。雷锋把党比作母亲，把毛著比做阳光雨露方向盘，“为了党，愿洒尽鲜血，永不变心”；“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甘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银幕上的雷锋促进了对党的盲从，强化了对毛的崇拜，将国人的宗教情怀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但是，银幕上的雷锋还缺少新人的斗争精神、英雄情结、“泛敌意识”和“特异功能”，他把迷路的老大娘送回家，而不问老大娘的什么成分；他给灾区人民寄钱，而不教育他们自力更生；他利用假日义务劳动，而不管建筑公司姓资还是姓无。与《雷锋》一样，《年青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霓虹灯下的哨兵》等影片也在努力塑造新人，但这些新人跟雷锋一样，还有诸多杂质。

文革故事片的功能之一，就是将人物提纯——重拍片《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中残存的那一点点暗示性的男女感情，也不复存在；重拍片《年青的一代》，保存了“为了世界人民的幸福，为了共产主义英勇斗争”的政治豪情，

剔除了山谷的微风，天上的星星，林中的鸟鸣这些小资情调。^[25]

文革故事片的功能之二，是将人物漂白，使红卫兵、造反派、工宣队光鲜亮丽地进入革命历史，与长征、抗日、延安、反右、大跃进中被洗净的历史人物一道，进入红色文化系统，以教化后人。《山村新人》中的方华提醒那位落后的同学，不要忘了戴上红卫兵袖章。《芒果之歌》中的夏彩云用红卫兵的造反，受毛的接见来促进学生的大联合。《阿夏河的秘密》中马青山老伯给红小兵讲的小红军的故事，并将小红军留下的刺刀送给孙大亮、扎西和马甲甲等情节，处处表示出这种正典化的努力。❏

目 录

导 言

第一编 概况

第一章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文革文化的指南与蓝图

第一节 《纪要》解读

1. “文艺黑线专政”
2. 破除对中外经典的迷信
3. 树立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样板
4. “两结合”的创作方法
5. 重建文艺队伍

第二节 《纪要》的意义

第三节 《纪要》的坚守、后退与发展

第四节 《纪要》的善后

第二章 旧观念 新发展

第一节 江青的标准

第二节 理论：“三突出”

第三节 母题：继承与改造

1. 增加：新生事物

^[25] 1965年拍摄的《年青的一代》中，有一首流传很广的插曲——《勘探队员之歌》。这首歌的歌词很抒情：“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是那天上的星，为我们点上了明灯。是那林中的鸟，向我们报告了黎明。”

2. 剔除：爱情与亲情
3. 置换：新旧对比
4. 强化：歌颂与效忠、革命与斗争、英雄与模范

第三章 电影大批判

第一节 “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

第二节 第一推动力与写作组

第三节 群众组织

第四节 批判方法与媒体配合

第五节 效果与影响

第四章 电影人的生存状态

第一节 “有问题的人”

1. 批斗
2. 抄家
3. “牛棚”
4. 案件与专案
5. 死难与自杀

第二节 造反派

1. 什么人造反和为什么造反
2. 造反派的所作所为
3. 造反派的结局

第三节 劳动改造

1. “五七干校”
2. 农村插队落户
3. 工厂“战高温”

第五章 电影的生产与审查

第一节 私人订货

第二节 集体创作与“三结合”

第三节 电影审查

第六章 电影的禁映与放映

第一节 电影的禁映与违禁

1. 禁映中的私映
2. 删剪种种

第二节 组织传播：电影的放映

1. “毒草”影片：批判性放映
 2. 样板戏电影：学习性放映
 3. 毛主席接见：运动性放映
 4. 常规性放映
- 第三节 内部放映
- 第二编 样板戏电影
- 第七章 样板中的美学与神学
- 第一节 样板之美：纯洁化与符号化
- 第二节 塑造英雄与追求崇高
- 第三节 “造神”运动：途径与功能
- 第八章 样板戏电影中的心态
- 第一节 时代焦虑症
- 第二节 教科书与假想敌
- 第三节 仇恨与悔过
- 第四节 革命历史
- 第九章 样板戏电影的叙事
- 第一节 叙事机制
- 第二节 叙事模式
- 第三节 代码与功能
- 第三编 文革故事片
- 第十章 文革故事片概说
- 第一节 结构：三个板块
- 第二节 叙事：三种模式
- 第三节 人物：新人形象
- 第十一章 革命历史与战争题材
- 第一节 重拍片的特征
- 第二节 《车轮滚滚》：提纯与变形的民心
1. “进步与落后”的今昔对比
 2. 战争的正义性：在历史面前

第十二章 工业题材

第一节 “工业学大庆”的新公式

第二节 《创业》解读

1. 谁保护了玉门油矿
2. 谁发现了大庆油田
3. 靠“两论”起家
4. “大庆精神”

第十三章 农村题材

第一节 集体经济：“长青藤”与“向阳花”

第二节 《金光大道》解读

1. 两类人物，一个问题
2. 发家致富与“穷过渡”
3. 暴力的功能

第三节 《青松岭》解读

1. 拣榛子：花钱靠自己
2. 卖榛子：钱广与雷锋
3. 艺术作品的生命力

第十四章 女性题材

第一节 银幕上的女性

第二节 《山花》《海上明珠》解读

1. 两个故事，一种女性
2. 新女性的忠孝观
3. 家庭的退隐
4. 用女性“去欲”

第十五章 儿童题材

第一节 “好孩子”的变与不变

第二节 《闪闪的红星》解读

1. “不要怕写高了，是怕写不高”
2. “妈，你是党的人，我就是党的孩子”

第十六章 教育革命

第一节 教育革命与教育题材

第二节 《决裂》解读

1. 与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
2. 教育目的、教学方法与教劳结合

第三节 《小将》解读

1. 数学竞赛：把学生当敌人
2. 学生贴大字报，批智育第一
3. 李师傅上课，孙老师认错
4. 新型的师生关系

第十七章 赤脚医生

第一节 农村的合作医疗

第二节 《春苗》解读

1. “有限现实主义”
2. 造反有理

第三节 《红雨》与《雁鸣湖畔》

第十八章 知识青年

第一节 《山村新人》解读

1. “人性论”批判
2. 回归常识

第二节 《寄托》解读

1. 物质刺激
2. 理想主义的流变

第三节 回归理想主义

第十九章 工宣队与《芒果之歌》

第一节 毛主席送芒果兴奋异常

第二节 制止武斗，搞大联合

第三节 旧大学之罪：白专与忘本

第四编 政治斗争的工具

第二十章 “文艺黑线回潮”与毛泽东的调整

第一节 《创业》：张天民告状

第二节 《海霞》：谢铁骊、钱刚写信

第三节 《园丁之歌》：湖南省文化局的报告

第四节 第四波“非主流”

第二十一章 “阴谋电影”

第一节 “阴谋电影”的尴尬

第二节 “阴谋电影”的创作与生产

第三节 “阴谋说”与“利用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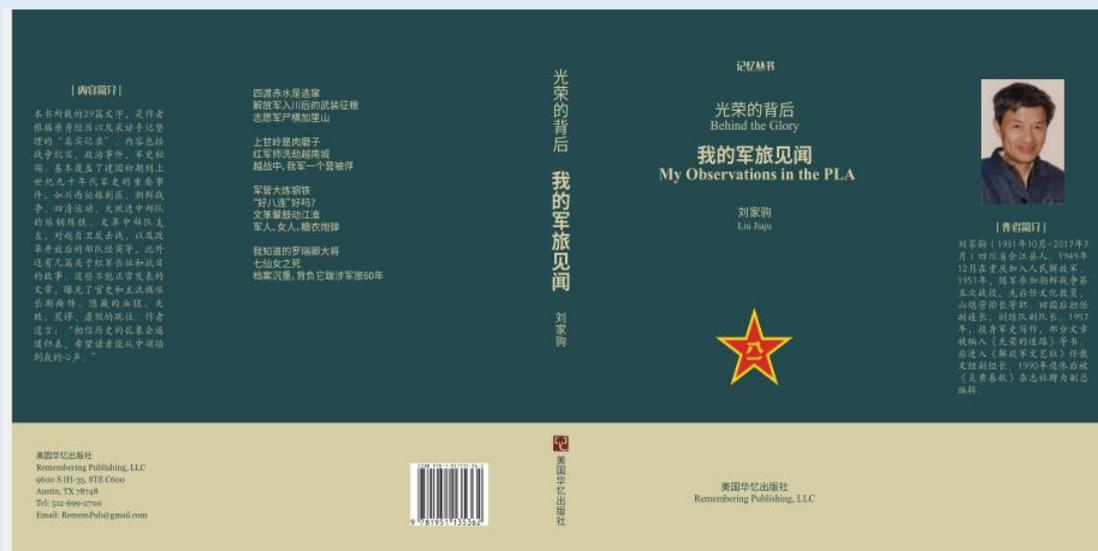
第四节 “走资派”与造反派

结语：清扫旧影坛，建设新文化

后 记

参考文献与片目

【散文随笔】



光荣的背后
——我的军旅见闻
BEHIND THE GLORY
MY OBSERATION IN THE PLA

刘家驹 著

《军旅杂忆》序

——心和血的记录

鲍彤

刘家驹先生是军旅记者。1949年第二野战军进入四川，在重庆招募学生入伍。家驹弃学应试，从此终身当兵。从文化教员到连队军官，再到政治部宣传干事、军事记者，走过不同寻常的军旅生涯。发表的文字，被他一概视为身外。他说心血全在手记中。确实，被发表就必须被审查，被放大缩小，被美容，被无中生有。歌功颂德的初心和使命一实现，报道的本质就变化了。可以使家驹倾聚平生心血涕泪的，唯有手记！

他有一位同行写了篇《最可爱的人》，惊天地泣鬼神，哺育了几代人，成为爱国者的基因。家驹不会写那种杰作。家驹他日日夜夜守在火线上，不必出差到朝鲜去体验生活，上甘岭恰好是他的阵地。他有自己的记录——非官方的记录，另一类记录，其中有人有事，有生有死，有泪有血。一群群士兵（碰巧，百分之九十是从国民军“归顺”的所谓“解放战士”），缺食，缺弹，没有冬衣，麻木，肯定有本能，不一定有意识有“志愿”，一个个被卷入死亡的磨盘，成为肉酱，冻尸，饿殍……——这是我作为读者的感觉，不是家驹的原话。

家驹参加的第一场战争，是内战！不是跟国民军作战——而是跟不愿意缴纳军粮的人作战。战场就在四川，战役就叫征粮剿匪。当年的四川人没有不知道“征粮剿匪”的，正像此后的中国人没有不知道“抗美援朝”一样。征粮剿匪由中共中央下令。征哪里的粮？征四川的粮。征多少？三十亿斤！——入川官兵六十万，一人要供五千斤粮？天晓得。完不成怎么办？完不成就剿匪。你不缴，你就是匪，就剿你。所以征粮成为打仗。国民党为抗日征粮，不“剿匪”，有帐可查，明明白白告诉你已经预征到了“民国48年”。共产党征粮是夺粮，没有帐，没有人知道自己被征到了哪一年。这是解放军献给四川人民的第一个服务。三十亿斤任务最后完成了没有？家驹没有写，大概不知道。

都说毛泽东用兵如神。家驹也有采访手记，对象包括国防部长耿飏。遵义会议后，毛一意孤行非打不可的第一个战役叫“四渡赤水”。那时毛大权初握，踌躇满志，异想天开，要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根据地。结果呢？主力部队（一军团）伤亡两千多。因妄想，而瞎指挥，而大败，而逃窜——这就是“真如神”

的毛，这也正是林彪当年写信建议不再让毛泽东而改由彭德怀指挥作战的由来。

家驹杂忆二十九篇，篇篇涉及历史，提供了不同于官史的记录。对同一事件有多种不同的记录，很好很正常，过去需要，将来需要，眼前又何尝不需要？神，用神心神笔写神史。人，只有人心人笔，只能写人的手记。有人怕另类记录不够正能量；但是在我看来，真应该比假更值得珍重。📖

军中董狐笔

——怀念刘家驹

高瑜

中共是枪杆子里面打出的政权，枪杆子的地位只服从党魁。文革中共九大确立的毛林体制算得上是标配。为什么这种标配 9.13 之后难以为继，是刘家驹先生大半生用笔挖掘的真相。1988 年初，罗点点给我介绍了林豆豆，加上豆豆和我先生互称战友，豆豆就直接把我带到北太平庄总政宿舍，这段笔缘使得我得识军中的一杆笔。这杆笔的分量有多重？至今并不为世人知晓。

刘家驹人生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参加过朝鲜战争军旅作家。1986 年解放军出版社拟了一个为十大元帅立传的计划，其中不能没有林彪。因为刘家驹有多年的军队文艺创作和编辑经验，善于把握政治关口，特聘他撰写林彪传。他几年内采访了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和毛家湾的里里外外，终于走到采访黄吴李邱“四大金刚”时候，没想到第一个目标李作鹏，就粉碎了他全盘的写作计划。李给公安部写了封检举信“筹谋为林彪翻案”，总政立刻责令刘家驹停止一切采访活动，随后就下达了退休令。

刘家驹厚厚的箱底没有沉睡，带出一批军旅作家，包括张正隆和他的《雪白血红》。

1991 年 5 月“六四”反对开抢的七位开国将军之一——肖克上将，84 岁筹办政史月刊《炎黄春秋》，聘请两位军旅作家洪炉和刘家驹担任正副总编辑。开办之初几年，社审稿每期都是刘家驹送到肖克家里，老将军逐字逐句终审完才送印刷厂。肖克确立了对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客观、科学、“不虚美”“不掩恶”，敢担风险的办刊方针，直到他患重病住院。刘家驹在《炎黄春秋》工作 13 年，是他人生第二个春季。

2003年，刘家驹彻底退休，72岁的老军人翻开50余年的尘封笔记，曾经必须刀砍斧削的一批“负面”记录，泛着血腥，显露着丑恶，重重地锤击着他，让他必须放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去思考，去批判。

大约是2010年，他给我送来一篇1万4千字长文《我经历的朝鲜战争》是他从文化教员到收尸排排长的经历。因为后勤补给跟不上，志愿军完全不是“吃一口炒面咽一口雪的最可爱的人”，他们抢夺朝鲜百姓的粮食，把带路的朝鲜人灭口，争抢尸体的内脏……。这还不是全部，“白大腿好吃”还没有敢写进去。泯灭人性的战争在于它的非正义性。我征得老刘的同意，推荐给何频，发表在《新史记》。至今震撼的影响仍在。

上述文章不包含在《军旅杂忆》里，该书搜集了朝鲜战争的另外两个姐妹篇。需要特别提及刘家驹的最后遗作，一篇征求意见稿，这是2016年7月《炎黄春秋》杂志社整个被抢劫后，他拖着瘦弱的病体，为《炎黄春秋》立传。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刘家驹一生最后阶段，用良知与大无畏记录着中国军队和战争，他堪称军中董狐笔。📖

我的留言（代后记）

刘家驹（绝笔）

我的大限已至，离世之前，留下些心里话向你们诀别，祝愿你们幸福长寿。

我是1949年12月在重庆参军的。12军的军政大学，以及所属各师的干校，各团的随校，军师团的医疗机构和文工团队等，先后在重庆地区招收大中院校学生入伍有9600多人（我们这批励志报国的学生，在朝鲜战场上伤亡有600多人，其余的人大多因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言论右倾遭到清洗，最后留存在军队的仅有55人）。

我进入35师干校后，学习社会发展史，参加征粮剿匪。1951年，12军投入朝鲜战争的第五次战役。我从文化教员改行到师属山炮营三连任见习副排长、排长、指挥排长。战争结束，回国后担任副连长，训练队副队长。1957年，师政治部借调我参加12军部队史写作，并为老干部代写回忆录。

我是高中肄业的文化程度，担当写史真让我难为。这是组织做出的安排，必须遵从。我努力阅读军史史料，学习范文，请教学者，在摸索中提起了笔。

当时，全军各个部队都在组织写军史进行光荣传统教育，总政治部的指示告诫：下笔不得暴露我军的阴暗面，每篇文章都要紧紧把握住人民军队的“光荣、伟大、正确”这一宗旨

从1957—1959的两年间，我在这一规范下，为师团干部代笔写出进军四川的《抢渡乌江》，解放重庆的《山城拂晓》，成都战役阻止胡宗南10万残军西窜的《不让敌人逃往康藏》。我还记下《大破铜鼓寨》，《巧袭观音庙》等一组我军征粮剿匪的故事。

关于朝鲜战争，我记录整理了《司号员到指挥员》《在医疗战线上》《上甘岭的一支车队》和战斗英雄胡修道的小传等篇，编入《光荣的道路》下发部队。1964年我参与写《郭兴福和他的战士们》后，《解放军文艺》社收编了我。

我到编辑部当了散文组副组长。散文组要编发大量的革命战争回忆录，对红军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方方面面稿件中的史实查询，我走访老革命，获得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其中有不少血腥的、丑恶的史实。比如，苏区莫须有清除“社会党”“AB团”，滥杀自己人近10万；长征流窜中为求生存一路的打砸抢；四渡赤水碰壁川军之后的大逃窜；抗日的平型关一役，自己伤亡两千八，杀敌只八百三；百团大战，只出动三万一千人，打了几个小仗，还夸大了敌人的伤亡；解放战争，在东北制造了令人心冷齿寒的死城、鬼城、血城；朝鲜战争是我军为金日成火中取栗，伤亡近百万……为凸现我党我军的光辉，大量的“阴暗面”史实被涂上“金”或被掩盖。我问过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我们是一支胜利了的军队，为什么就不能向世人说出些史实的负面？”陈回答了一句话：“暴露我军的短处就是给反动派帮大忙。”

我进入《解放军文艺》正是文革时期，得“天”独“厚”，总政图书室管理员专为我开放禁书。我阅读了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仲马父子等人的巨著，他们批判现实的丑恶对我产生了重大影响，大量的负面史料我都记录在案。

1990年代初，我从《解放军文艺》退下来，走进《炎黄春秋》担任副总编辑。这里是从意识形态营垒冲杀出来的一帮老革命搭起的自由民主平台，他们敢把党史中不敢示人的秘闻和自己苦难的政治经历捅向当今社会。一篇篇震撼心灵的文章，引发我的共鸣。老革命谆谆教诲我摒除党文化偏见，远离立场观点，用刘知几“不掩恶”“不虚美”的史德审视我军这支“王者之师”。

2003年，我从《炎黄春秋》退下来，打开尘封已久的笔记，捡选些记忆深刻的人和事，审视它的典型性和社会意义，写成些独立短小的篇章。

我记叙的战争有：朝鲜战争的第五次战役，为攻取加里山，我所在的35师是用三千战士前仆后继的血肉之躯堆上山的。我是掩埋组长，面对自己战友横尸异国山野，血在心底流淌出《血路，血本，血酬》。

越南人忘恩负义，我们自卫反击的惩罚手段很丑恶，我写下《红军师洗劫越南城》，讲述该师把一座秀美的同禄县掠夺一空。

抗日战争结束，太行山下日伪的“土围子”还在顽抗，我军打开后，把俘获的众多的匪徒（包括匪首家属）当靶子。《杀土顽，壮胆气》所记录的，就是这场令人毛骨悚然的反人类大屠杀。

记叙的政治事件有：国民党退出大陆前，四川的田赋已征收到1958年，我军入川后，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出现粮荒，邓小平按中央指令在四川强征30亿斤粮。军队出动《武装夺粮》，把两百万老百姓逼上了梁山。

全军树立的“南京路上好八连”之所以“好”，是在上海滩繁华闹市进行的封闭式管理，才保持了“一尘不染”。我1975年深入“好八连”探访，发现他们如同蹲在大上海的一座小监狱。

1958年全国大放农业“卫星”。我参观了江西波阳三庙前公社的“水稻亩产13万斤”的现场，愤怒的公社社员向我们揭发：丰收的“成果”是几百付粮担绕着村转圈秤出的。

党指挥枪用于战争，也要枪杆子为政治斗争服务。文革兴起，280万解放军投入“三支两军”。《文革鞞鼓动江淮》，是记叙我12军进入安徽“支左”，军人无处不在建立的军政权，却是反宪政的无产阶级专政。

云南个旧县沙甸回族乡，在文革中清除四旧时，汉族造反派侮辱了可兰经，还给回族的谈判代表用猪首扣在头上游街示众。回族人以不共戴天仇的义愤持枪反抗，遭到“支左”的14军无情镇压，杀死1600多人，杀伤近千人。我这把一惨案记为《沙甸人的恩仇》。

人对性的渴求为常情，我在《军人，女人，性，糖衣炮弹》中，记叙了我军从将军到士兵在严格纪律约束下仍是性乱难止的见闻。

《军商，我的能见度》是写我军缩减军费，让军队走向市场，不惜恶劣手

段与民争利的乱象。

罗瑞卿是我军人人敬畏的锄奸、镇反能手，残酷的政治斗争发展到文革时反把他整得跳楼。他之所以四面树敌，是他握持生杀予夺的大权，性格孤傲，身兼党政军要职后威风八面。《我见闻的大将罗瑞卿》，就是揭示他的霸气。

关于“严凤英之死”。黄梅戏之花严凤英，文革中被列入“牛鬼蛇神”，她已知自己无法在专政下生存，临死前还向社会表白：“我生是毛主席的人，死是毛主席的鬼。”她的死，我算半个见证人，我记下她不为公众所知的死因。

我还铭记些愤世的小人物，如《抠八》中我的战友常仁，他家世代贫农，欢天喜地迎了解放，让他无法承受的是得到的翻身生活，比当初的贫农还贫困。公社化时，连他祖上留下的一棵树也要充公。他抗争，军队容不下他的“阶级异己”，打发他回乡重扛锄头。

芦花，一个烟台的农村妇女，我的远亲，丈夫仅因和邻居口角就被关死在派出所。芦花进京告状无果，回到家披麻戴孝向市委申冤，得不到回应，她愤懑难平，只身在烟台市的车站码头大街散发“还我丈夫”的传单。这位“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刚直的妇女，最终得到40万抚恤金。

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官方劫收了《炎黄春秋》，我身心已严重危弱，仍写出《炎黄春秋的历史和她的‘虚无主义’》抗争。

我们党本应是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的党，讲真话，办实事，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宗旨。篡改党史军史是对国家民族的巨大危害，我曾渴望领导人中有良知者会向国人作出深刻的忏悔，可叹的是——由期望、失望变成绝望。

我留下约70余篇文字暂时还不能发表的文稿，它反映了我一生经历和见闻的历史暗角。我的信念是——历史的乱象还会返璞归真的，也望你们能从中领悟到我的心声。

我匆匆走过八十五年，自信无愧此生。我的文字，任由历史和后人评说。古人云：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

我相信历史。

我相信未来。📷

【编读往来】

赵大为问：《记忆》是免费还是收钱？

方惜辰主编 台鉴：

我是《记忆》的忠实读者和私家收藏者，最早收藏的是《往事》和《赵紫阳研究》，后来是《往事微痕》和《记忆》，2014年又发现了《昨天》和《周末文刊》。除了马悲鸣的《周末文刊》有千字15元的版面费之外，其他刊物都是免费的。最近在樊能廷《真相与谎言的碰撞》一书中看到，《记忆》每期收费15美元。这是版面费，还是订阅费？什么时候开始？请您在百忙之中拨冗说明。

老方答：《记忆》分国际和国内两种，国内版一直免费。

赵大为先生：

您提到的樊能廷的书，以及书中说《记忆》每期收费15美元的事，在您来信之前，我们已经知晓。下面回答您的问题——

《记忆》有两个，一个是2008年创刊，面向国内受众的普及性的刊物，没有实体（纸版）只有电子版。另一个是2019年在美国创刊，面向海外中国学研究者的实体性学术刊物。前者一直是通过信箱免费发送，既不收版面费，也不收订阅费。后者通过英文网站（lulu、google）出售。有实体版（纸版）和电子版两种。实体刊每本售价30美元，电子版每本售价15美元。哈佛、史丹佛、北卡罗、伯克利等大学有订。

这两个刊物名字相同，但体例、定位、周期和内容大不一样。在美国发行的《记忆》是学术刊物。每年一卷每卷四期（依据春夏秋冬之序），每期20万字。按国际学术刊物的规定，每期须有五篇学术性论文。在国内发行的《记忆》，最初几年是月刊，后来变成了半月刊，再后来改为不定期。一般情况下，每期六万至七万字。虽然偶尔也发表学术性文章，但是它的基本定位是普及性的文史杂志。

樊能廷所说的《记忆》每期15美元，说的是国际版。国内版的《记忆》曾刊发他多篇文章，没有收过他一分钱版面费，更不曾收过他一分钱订阅费。☞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成为本刊会员，遵守本刊规定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刊训。遵奉众生平等，百家争鸣之精神，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本刊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方惜辰

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